

第一輯

青年模範叢書

我國歷史  
上知  
識青年  
從軍之  
先例

諸葛亮

周佐治編著



青年模範叢書

諸葛亮

周佐治編著



3 0661 3861 5

青年出版社發行

# 青年模範叢書

##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 壽、蘇 武 (二)衛 青、霍去病 (三)馬 援 (四)班 超  
(五)諸 葛 亮 (六)李 世 民 (七)岳 飛 (八)辛棄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克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松坡 (八)黃花園

##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青年；此其所爲，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爲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援  
(四)班超 (五)諸葛亮 (六)李世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三)秋

瑾

(四)黃 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 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專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 諸葛亮

## 目次

###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 一，前言……………一
- 二，動盪的社會……………七
- 三，三國的形成……………一九
- 四，武侯的青年生活及其出處……………三七
- 五，漢代學術的演變及其思想……………四七
- 六，偉大的軍事天才……………五九



七，聯吳與平蠻·····	八七
八，新政治，新風·····	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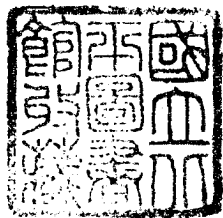
# 諸葛亮

## 一、前言

諸葛亮的一生事跡經過傳記家的傳述，文藝作家的渲染，詩詞家的品題吟詠以後，

真可謂大名垂宇宙，遺事傳千秋。不惟智識分子道其名，即能論其事，就是一般的民間

也往往能繪聲繪影的講述不絕。由於他聲名的廣被，影響的深入，歷來的文人對於他就  
有各種的評議，上至他的功業，學養，下至他的一言一行，莫不加以詳盡的推敲。這其  
間，因為各人主觀立場的不同，看法與意見就有顯明的歧異，有推崇備至，無善不臻的  
論調，也有借題發揮，求全責備的批評，但是大體說來，還是譽多於毀，揚多於抑。他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舊佔着景仰與膜拜的地位。



抗戰軍興，國都遷蜀，這著名的「天府之國」，正是諸葛亮晚年大展經綸，甘棠遺蔭的舊地。遺跡遺事，觸目動心，懷古幽思，情所難免。同時國家正值整軍經武，力謀反攻；勵精圖治，以求建國的際會，關於他的軍事才能以及爲政的措施有很多值得借鏡，從而對於他又有一番新的發掘，新的評價。這一些新的探討，的確有不少清新之見，爲前人所未道，頗值得我們的讚賞和惕勉，不過仔細的鑒別起來，內中還是不免有囿於成敗，或混淆是非的說法。固然我們論衡古人，誠如王船山在讀通鑑論中所說：「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爲榮；貶其所不勝貶，而姦邪顧以爲笑。」可是我們也不能如他所說的：「放於道而非道之中，依於法而非法之審。」我們應該「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來加以批判。

說到月旦歷史人物，我們都曉得「知人論世」這句話。其實所謂論世，就是「因其時，度其勢」，換句話說，就是要明晰當時的時代背景，和體會當前的客觀形勢及趨向，這兩點判明以後才能談到知人。所謂知人，就是「察其心」，心就是志向和修養，也可說

屬於主觀方面的動機和抱負。要上述的客觀的時勢，以及主觀的志趨都能分別的認識，而加以融會貫通，才能「窮其效」。如此，我們才不會以失敗論英雄，才不會固持成見，以是爲非。

我們檢視所有諸葛亮的評傳，能夠達到上列標準的，尙屬罕觀，就是有與上列主旨無形中契合的，也嫌不夠深入和刻畫，就論世方面說，一般注意到的是政治情勢，而就沒有注意到與政治情勢互爲因果的社會經濟組織；就軍略方面說，大家只談到政略與戰略的配合，以及地理形勢，經濟因素，而沒有體認到戰略與戰術本身的功能及其應用；就知人方面說，多數都是掇拾其言行中的一鱗半爪作爲論斷的根據，從而斷定他是儒家，法家，或內儒外法，或法道合抱，就沒有追溯漢代學術演化的動態，以及政治與學術的交互影響。

此外，我們認爲他那種忠心耿耿，扶翼正統的愛國精神實在值得我們的珍視，尤其是在那氣節不彰，是非不明的東漢末季，他不啻是一顆冲破黑暗，賦予大地無限光明的

日月行星，就是千年後的今日，牠的光芒與熱力並沒有絲毫的減損，遠足以啓發和溫暖一般富有正義感者的心。同時，在他隱居南陽時，也僅是一個書生。但一遇到英明的劉備，就委身相從，參加軍旅，爲國家效馳驅，而所表現的將才與軍略都是超羣拔類，並世無雙。這一方面是表現我國傳統的「文武合一」的教育，多麼值得寶貴和發揚；一方面是爲我們生當大時代，又逢英明的領袖領導於上的青年們描繪出一幅光明的遠景。使我們深深的體驗到，要扶持傾危的國家，要掃蕩割據稱雄的國賊，要正義與公道能夠宏揚於天下，惟有以軍事力量作後盾。而這種軍事力量的形成，就是一般明大義，識是非的青年們的肩上。我們看一看後漢末葉的局面，凡是能夠集合一批烏合之衆，或者用異端邪說來蠱惑民衆的人，都可以佔據一州一郡，自尊自貴，假若不是諸葛亮一手造成蜀漢的歷史，並揭發殲除國賊，統一中國的口號，給予野心者當頭棒喝，那麼在當時更不知要出現多少紛亂的事跡，也不曉得要傳播若干皂白不分，義利不明的思想遺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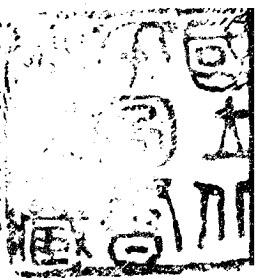
由於他這種愛國從軍的精神值得效法，以及他爲政的措施，軍事的天才值得闡揚。

因此，就想本着前面所提出的新看法來編着這本「諸葛亮」。書中的着眼點是這樣：由社會經濟情形的分析說到東漢末年的政治紛爭和軍事擾攘，以及三國的形成；由政治，經濟，地理等因素來解釋軍路的造因，再由戰略，戰術的觀點來批判他軍事上的成就；由學術的演變來認識他的思想淵源，再由他的思想淵源來體察他的爲人處世，以及政績的表現和優劣。這三點是本書構成的主要支柱，都想加以個別的闡述。不過，政治，經濟，軍事這些因素都是息息相關，互相投射。因此在敘述每一主題的時候，難免不牽涉到旁的內容；同時本書近於傳記體裁，爲顧全事實的連貫和醒目，對於上列的三點又難免不將其割裂而滲透於旁的章節之中。但是大體說來，本書的結構，仍想力求其完整，不願意太過於支離破碎，使每一章沒有一個顯明的輪廓。至於他從事軍旅的經過和表現，以及他對國家的忠謀盡籌，最值得重視，故多加以詳徵博引的說明。

諸葛亮

## 二、動盪的社會

東漢末年的社會是一個極端動盪不安的社會，就經濟形態說：由於商業資本與大地主的交織，土地兼併的趨勢更形深刻化，若干大姓豪族乘時興起，他們利用經濟的勢力做軍事政治鬥爭的後盾，擁有的佃戶農奴一方面是他們經濟的來源，一方面就是他們武力的根據。至於原來在政治上佔極大勢力的封君，早已受經濟潮流的氾濫而湮沒，不能再求死灰復燃；因為漢代的封君制度本來就不是建立於莊園制度之上，而是建立於郡縣制度之上，這就是說，這些封君們經濟的來源是取之於領土內農民的地稅（Land Tax）而不是地租（Land Rent）。在經濟剝削的程度上說，地稅遠不若地租的深刻，因此收入方面自然是相形見縮，封君為求應付龐大的開支只好向商業資本低頭借貸，史記平準書就有這樣的記載：





「富商大賈，或躡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

這雖是西漢時的情形，但一直到東漢，這種情形只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我們看東漢末年仲長統所描述的，他在所著的昌言上說：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

由於封君的沒落，富商及大地主就應運而起，他們有政治上的潛勢力作後盾，因而對於農民更是無情的壓迫和榨取，盡量滿足他們的私慾，於是這佔人口最多數的農民羣就只有有在饑餓線上掙扎，良善的日在淒風苦雨中生活，強項的自然不安於胼手胝足而不得溫飽，爲着解除生活的桎梏，隨時都有挺而走險的可能。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經濟的情形既是極端不安定，包藏着一觸即發的危機，那麼政治的形勢自然也是非常的動盪與紛亂。先就政權的體制來說，無論西漢東漢都是朝着中

中央集權的路線走的，在君主一方面固然如此打算，而經濟方面，由於商業資本與地主階級的勃興，無形中促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因為交易頻繁的結果造成各個地方經濟的依賴性，同時慳遷有無的順暢進行以及地租的順利收繳都有待於割據形式的泯除，使治安獲得良好的保障。當着政治要求與經濟趨勢相合拍的時候，新的政治組織就有實現的可能，從文帝時賈誼削弱藩室的建議，景帝時鳳錯強幹弱枝的主張起，理想與事實，終究趨於符合，國家的大權集中於王室之手，君主有最高的權力。假若上有明君，下有良臣，未嘗不可臻於郅治。但是明君不世出，良臣不易求，於是形成宦官與外戚互起專權，政治不堪開問的局面。尤其是東漢時光武鑒於權臣的僭竊，竟連徒有虛名的丞相制度也不惜廢除，代之而起的三公（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寢假也成為論道的高爵，不聽預聞政事。結果大權真正集中於君主，又替宦官與外戚大開方便之門。所以自章帝而後，在政治上表演的就只是宦官與外戚明爭暗鬥，攫取政權的史實，還說得到澄清吏治，安邦定國，自然是貪污橫行，官常敗壞。

政治與經濟的混亂不寧，遂使動盪的社會轉變爲軍事的恐怖與紛爭，如黃巾賊首領張角就擁衆數十萬，四處劫掠，州郡失據，此外如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都是到處裹脅，大者二三萬人，小者亦有六七千人。在這種盜賊蜂起，危機四伏的情況下，各地的地方官吏還是一昧收括聚斂，結果更造成推波助瀾的局面。故太常劉焉乃建議道：

「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濟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

劉焉這個建議對於當時的局勢不失爲一個良好的對策；但是彼時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情勢已不容許其實現，相反的只有促成各地的割據。因爲當時的中央集權政府只有軀殼而無靈魂，對於各地根本失去控制的力量。同時各地郡守以及豪右等爲着擁兵自衛，需要很大的軍費，不惜向人民盡量的割剝。加上各地盜賊的蜂起，田園荒蕪，市場破壞，原有的經濟紐帶解體脫節，本來可以推動社會的原動力——商業資本及大地主的興起——無形中受到損壞。於是在政治形態中反映爲逆轉的趨向——由中央集權到地方割據。又何

况劉焉這批人根本沒有爲國家效忠，爲民衆造福的思想，在三國志他的本傳裏就有下面的記述：

「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今四川）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

所以劉焉的本意，最初是在避難，換言之，也就是想尋一塊安樂土來過唯我獨尊的王侯癡。在益州平定以後，「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就是他本心的實踐，由於各地州牧的威權日大，又與當地豪族多所結納。加以中央政府操持宦官外戚之手，根本沒有朝廷的威信。因此形成內外俱輕的局面，凡是具有資財的憑藉，不管是仕宦之後，或商業家地主等都羣養賓客或死士，乘機逐鹿，冀圖一逞。甚至赤手空拳的人，只要有人贊助資財，就可聚衆作亂。由於這種經濟力量與政治軍事力量的結合，使得一個國家之內分裂爲若干小國，我們看東漢末年的歷史，自從靈帝而後，雖以董卓這樣野心的權臣，也不能再求中央集權的實現，到了曹操專政，地方割據的勢力多已根植深厚，他雖

有安夷英雄「大志，但接攘多年，還是不能如願以償，然而就當時的政治經濟趨勢說來，他所表現的成績已算難能可貴了。

社會既是一個極端動盪的社會，國家也就成爲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有野心的人們想自創局面，有貴財的地主商業資本家想求一個有力的庇護，農民以生活無着想求一條出路。於是形成羣雄蜂起，中原雲擾的形勢。只看當董卓秉權的時候，跨州連郡，自斂財賦甲兵，自相攻伐兼并者就有十數人之多，茲錄其姓名及所佔州郡如左：

袁紹，居鄴（今河南臨漳縣），併冀青幽并四州。

袁術，居壽春（今安徽壽州），據徐州。

陶謙，居彭城（今江蘇徐州）。後劉備代，居下邳。

劉表，居襄陽（今湖北襄陽縣），據荊州。

劉焉，居綿竹（今四川德陽縣），據益州。

馬騰，韓遂，據涼州。

劉虞，居薊（今河北大興縣）；公孫瓚，居易（今河北雄縣），據幽州。

公孫度，居襄平（今瀋陽之北），據營州。

張魯，居南鄭（今陝西漢中），據漢中郡。

曹操，居鄆（今山東濮縣），并兗豫二州。

孫策，居吳（今江蘇蘇州），并揚州交州。

在這種羣雄割據之下，地方的權力真正成爲「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中央已失去不惟指揮，就連文書往還的關係也趨中斷。

這種動盪紛亂的社會，正是有野心者各展雄才的大時代，所謂「時勢造英雄」，這就是造英雄的好時勢，上面所列舉的人物以後各人的前途縱有不同，但他們的確都曾顯赫一時，俱有光明的遠景，他們後來其所以有成敗的分野，原因固然很多，可是概括的說來，凡是才不足以行志，明不足以知人，而又想妄竊非份，毫無民衆的支撐者，必定演成衆叛親離，不戢自焚的後果。如袁紹，袁術的家世是「四世三公」，聲望是「勢傾天下」

；但紹則「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術則「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苦之」。結果二人皆身敗名辱，爲後世笑。其次如劉表，居天下要衝的荆襄，因緣時會，有舉足輕重之勢，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俊傑人才，但他都不能用，如劉備、毛玠、甘寧都曾經投奔他，可是劉備雖受厚待，而不能推心置腹；毛玠、甘寧則鑒其政令不明，終必無成，遂奔他處。再如驍勇義戰，並世無雙的呂布，自手刃董卓而後，威震天下；但「性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兼以性情反覆，見利忘義，雖聘馳東西，還是一事無成。

現在回頭來檢視三分天下，鼎足並峙的三家——曹，孫，劉——其所以能成功的根源所在。

曹操在頭角初露時，就被太尉橋玄所賞識，曾經誇獎道：「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後來起義兵時，又得到陳留孝廉衛茲以家財資助，由此一舉成名，他爲人雖雄猜陰險，但頗能網羅人才，故曹植在致楊德祖書中就有「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的話，同時他又能因才器使，就是有才無德的人，他也同樣的任用。因此得人最

多，勢力亦最爲雄厚。

至於孫權，他是承受父兄的基業而發揚光大，勢力亦頗不弱，同時他本人也是知人善任，江左的人才爲他所羅致的就不少，如周瑜，魯肅，張昭，陸遜等都是時期的知名之士，故雖在中原板蕩的時代，江東一隅還能休養生息，民心安堵，可見他的確有過人的長處。

最後說到劉備，他比曹操與孫權的憑藉更薄，境遇更苦，雖說他是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他的祖父雄，父弘都曾「世仕州郡」。但劉備未成立的時候，父親早死，家道已經陵替，故三國志本傳上說他「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後來得同宗劉元起資助，並稱讚他道：「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因此才有資求學，黃巾賊起，州郡各起義兵，他很想趁此機緣建功立業，苦於無錢，幸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的幫助，方能「用合徒衆」。到了呂布襲下邳，敗軍之餘，幾至一蹶不振，又得糜竺的饋送金帛。軍資才有着落。三國志糜竺傳上就說：



「於是進妹於先主爲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

同時他不懂得資產者的贊助，就是一般的平民也非常擁護他，在魏書上有一段記載：

「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盞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

由於他的低身接納，博得一般老百姓的愛戴，所以當劉琮降曹操，猝然受攻擊的時候，他倉皇走襄陽，而荊州人跟隨走的達十餘萬人，當時就有人勸他棄衆速走，以保江陵，可是他說：

「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因爲他這種得人心，識大體的行動，就在不知不覺間感動遐邇，種下良好的後果，習鑿齒後來許述他這一節行徑，曾有一段名言：

「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願，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所以就抽象方面，將劉備來和曹操、孫權相比，他究竟高出一籌。就心術說，他是誠意待人，始終不衰；比曹操的機心忌刻，包藏禍心，自然來得高強，就名份上說，他是帝室之胄，隨時都以復興漢祚為職志，如參加董承的血詔密謀，就是膾炙人口的孤忠表現，比孫權的竊據江東，不能勤王自効，當然是瑕瑜判然。因此，希世的人才諸葛亮才能委身相從，願效驅馳，也才能寫出蜀漢的光榮歷史。

曙  
萬  
亮

一  
八

### 三、三國的形成

由於東漢末年社會的動盪，遂造成政治紛亂與軍事擾攘的局面。而原有的經濟勢力——地主與商人，就不能按照經濟進步的常軌突飛猛進。因此，反過來與政治力、軍事力相結合，另求出路。結果是助長了各地的紛亂與割據。這與西漢東漢初葉，社會經濟的趨勢促成中央集權的往事剛剛相反，是以紛爭的時期最爲綿長，到了曹操入朝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時候，勢力漸次龐大，各地的地主大族很多才望風使舵相率歸附，如荀彧、田疇等率領宗族前往；任峻、呂虔等召集家兵投奔；李典、許褚等統帶部曲相從。於是聲勢顯赫，遂能破袁紹，敗袁術，夷呂布，降劉琮，所有當時的羣雄幾乎全被剪滅，幸而有江東的孫權勢力尙足以相頡頏，因爲他秉承父兄的餘威，兼以吳中大族地主亦深相結納，如全琮的輸財召募，呂範的率私客百人來歸，皆足以見及一斑。所以他的力量也

相當可觀，只有劉琦這時仍在荊州，依人籬下，毫無有事業的基礎，後來要不是實踐了諸葛亮隆中對策的建議，恐怕很難得找出一條光明的大路。換句話說，三分之局，鼎足之峙的形成，將無由實現。爲了分析和檢討的方便特將隆中對策的全文錄引如左：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實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其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

，百姓孰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他這篇洋洋灑灑的對策，千年以後的今日讀起來，仍倍覺有無限的新意在，茲歸納爲下列數點：（一）魏應伐而目前不能伐，（二）吳不必伐可引以爲援，（三）據荊，益以爲事業的根基，（四）攘平戎夷以鞏固外圍，（五）脩明政治以安黎庶，（六）俟變以規復中原，這六點可以說是諸葛精心的結構，所有軍略政略以及內政外交，甚至治國平天下的策劃都陶鑄於其中。他今後二十多年的相業都是以這個決策爲依據。同時這六項方針皆有連鎖性與時間性，這就是說在橫的方面有相連的關係，在縱的方面有先後的次序。真所謂透明事理，脈絡分明，值得我們細細的體會研討。

不過目前所討論的是三國形成的胚胎，因此僅先將前三點加以詳盡的推釋，並引據事實作爲例證。至於後三點留待將來討論軍略、內政、外交諸端時再爲推敲。

（一）魏的形勢 前面已說過，曹操爲人富有才智，很能用人。故無論文人智士，地主豪族，歸附者甚多。同時他正值董卓臨朝，中央政治極端不振的時候，就在招合徒衆

，冀圖一逞。到了中平三年（西元一八四年），王允誅董卓，關中大亂，黃巾餘賊百餘萬入兗州，鮑信等迎他爲兗州牧，他就率兵討黃巾，將其降服，勢力從此寔盛，在三國志魏書他的本傳上就說：

「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接着他會同袁紹擊破袁術公孫瓚的聯軍，聲勢更振，到了建安元年他進至洛陽，捍衛京師，嗣又奉獻帝遷都於許（現河南許昌縣）。從此漢朝的政柄，就一直操之於曹氏之手，當是時劉備正做徐州牧，因遭呂布的襲擊，不能安身也來投奔他。乃會同進兵攻殺呂布。適巧此時袁術亦因病致死，他又唾手而得徐州，一時聲威赫赫，顯有削平羣雄之勢。會爲盟主而又勢力龐大的袁紹當然不干雌伏。於是紹親率冀、青、幽、并四州的人衆進攻許都，曹兵拒之於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北），這就是有名的官渡之役，曹操的興衰成敗關鍵於此，有或會寫信鼓勵他道：

「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

由這封信裏我們就可看出此役的重要，也可看出當時曹操的勢力雖說已漸次養成，但與袁紹比衡，仍覺「名微衆寡」。可是，知己知彼的曹操早已料定袁紹的不能成功。所以在  
大軍壓境的時候，還要去出征與董承同謀而實際並無實力的劉備，當時不明玄妙的將士，皆說：

「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奈何？」

操却答道：

「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  
遂遣軍擊破劉備。再與袁紹決戰於官渡，大破紹軍，紹因而嘔血死，青、冀、幽、并四州又歸曹氏，袁氏餘衆逃奔烏桓，建安十二年（西元二〇七年）他親征烏桓，遼東太守公



孫康斬袁尚袁熙首相送，軍乃還，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漢龍三公官，置丞相，以操充任，由是遂成爲名副其實的權臣。無論政治權力與軍事力量均可雄蓋天下。

由上面這一段概括的敘述，我們可以得着左列各點的認識：

✓ 1. 地大人衆 截至隆中對策時爲止，曹操已佔據冀、青、幽、并、徐、兗、豫七州，全部漢朝的境地共有十三州，他就佔了一大半。同時黃河流域是文化發祥之地，人才鼎盛，故袁紹有遣使迎汝南士大夫之舉，曹操亦有汝穎固多奇士的話，到了晉代，解結仍說「豫州人士半天下」。而曹操自己籍隸豫州，首由兗州起事，收羅人才之衆，自在意想之中，同時北人多習武事，兵員的補充，也較便易。由於地方大，人員多，就可足食足兵，這是戰爭中最不可侮的憑藉。

2. 政柄在握 自從曹操挾獻帝都許而後，事實上漢室的政權已在掌握之中。不過當時的元老舊臣尚多在朝，且職位是司空，（三公之一）故仍不能爲所欲爲，到建安十三年恢復丞相制以後，把持朝政就可名實俱符。拜將拜相，賜爵封侯當然可以予取予求。中

原人士未離鄉者自願附從，就是已散處四方者，誰無鄉土之恩，懷歸之念。尤以商人，地主在連年兵荒馬亂之餘，亦想攀龍附鳳，以政治作護符。同時，操的行徑雖說恣睢跋扈，彼時究係尊重漢室正統，逆跡尙未大著。故有識之士如荀彧，孔融等輩均不能潔身遠引，其他利慾薰心，爲官是圖的人自然趨前附後唯恐不及。因此力量日漸龐大，曹操本人也認爲從今以往，不難囊括四海，統一六合，在他的丁酉（建安二十二年，西元二一七年）獎功令內就說：

「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

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獲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賞。」

於是封列侯的就有二十餘人。

3. 知己知彼 所謂知己知彼，本來是軍事鬥爭中的必要條件；但是在政治鬥爭的場合同樣的也有相等的重要性，曹操在中原逐鹿的初期，其所以能成功，多數都以爲他用

兵如神，奇妙莫測，故能克奏膚功。固然軍事的成就在他一生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們認爲在政略方面能夠知己知彼，尤爲關係重大。因爲「戰爭不過政略的延長」，戰爭的歸趨仍是以政略爲支柱。換言之，要有政略作背景的戰爭才有價值，有意義。我們看他對劉備的認識：一則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再則曰「劉備，人傑也。」三則曰：「劉備，吾儕也。」因爲對於劉備有着這樣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後來用兵主要以劉備爲對象，總不讓他有羽毛豐滿的機會。前面已說過，當袁紹大軍雲集的時候，他還進兵下邳去攻劉備，使他不能立足，後來荊州劉棕降，劉備奔夏口（今湖北漢口）時，他還是遣兵窮追，兵一日行三百里。可見他是要得備而甘心。由於他的這種認識，終使劉備半身蹉跎，創業最晚。一直到後來他還是耿耿在心，不惜挪擁東吳，來破其同盟，這都是他一貫的政略之應用。

有了上述一二兩種原因，所以隆中對策中就有「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的話，有了第三種原因才惟有向東吳求援，找尋立身之地的權變方

策。

(二)吳的形勢 自孫堅崛起江表，舉義兵平黃巾，討董卓以後，聲名早傳播於東吳。不幸大業未成，就於擊劉表一役中戰死。他有子五人，以孫策、孫權最知名，夙與東南士大夫友善，深得江淮的人心。初孫策在袁術幕下爲將，鬱鬱不得志，屢思努力自效。苦無機緣。後來袁術攻揚州刺史劉繇不能克，孫策遂藉援助爲名率兵渡浙江，據會稽（今浙江紹興），平定吳中各地盜亂。自領會稽太守。但不久爲人所暗殺。臨死時對張昭等說：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  
遂親將印綬交與孫權，並說道：

「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死後，孫權代領爲衆，曹操聞策死，表權爲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命下時孫權頗爲懷疑

，應否接受不能決定，乃問計於魯肅，魯肅說：

「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

孫權深以為然，遂陽受曹操的節制，而陰以收拾人心，刷新政治為務，於是衆論翕然，江東大定。

由於孫氏在東吳的勢力根深蒂固，兼以江東的富有早已馳稱於世，在前漢盛時，即有吳中之富，甲於國內的傳頌，故劉漢以吳中一隅之地，恃其資力，竟足以起事。到了東漢末年，雖然中原板蕩，東南屢動；但始終無損於吳，休養生息，國力充沛。故諸葛亮說：「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就是深悉東吳實情與天下大勢的對策。

(三) 跨荆據益的根據 當劉備依附劉表伏櫪未伸之時，曹操已剪除羣雄佔據了七州，東吳孫權盤據了揚，交兩州，當時的版圖所存者僅荆、益、涼三州。但涼州馬騰父子深得羌人的擁護，事實上非力所能及。故僅有荆，益兩州有染指的可能。現在就荆，益

的形勢作一簡略的檢討。

荆州在漢時包括南鄧、零陵、武陵、長沙、江夏、桂陽、南陽七郡，就經濟的意義說，這些地方都是膏腴之地，同時因水路交通的發達，交易頻繁，商民殷富，軍需民食，均可取給，就軍事的意義說，荆州居天下要衝，自古為用武之國，北下漢河，可以進窺襄樊；東連吳會，可以控制長江之險。所以，當劉琮降操時，張昭就有「兵江之險，已與我共。」遂勸孫權束手歸降。魯肅聞劉表死亦說權道：「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曹操聞劉備在荊州，恐為彼所佔領，故南征。後來劉琮降，曹操仍恐備據江陵，乃不惜輕軍窮追，後來關羽出江陵，襲襄樊，中原大為震動，甚至有議遷都，由此可見荊州在兵要地理上的地位。

益州在漢代包括現今的四川及甘肅，陝西，雲南，貴州一小部份。就戰爭的地形來說：「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滬瀨之虞。」東扼長江，管鑰吳楚咽喉，北走秦嶺，窺秦隴關。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論四川形勢有云：「以戰為守守必固，以守為戰」

曠必險。可見四川控制形勢之要。就經濟情形說，益州自古就有「天府之國」的稱號。因為土壤肥沃，氣候溫和，農產非常豐富。其他如山林竹木，鹽鐵鑛產，莫不具備。故士民殷實，家給有餘，左思的蜀都賦中說：「家有橘柚之園，戶有鹽泉之井。」蜀志董和傳上也說：「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候服玉食，」可見地方的富庶。秦漢統一中國，皆以巴蜀為關中的倉庫。遂能富強天下。

荆，益兩州的形勢既如上述。假若被有才為之人所主持，則進可以爭衡天下，退亦足以自保。可是，當時的荆州，遇着無英斷，無果決，善聽小言，不知用人的劉表，以致徒據天下形勢之地，而不能有所施展。在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掃蕩袁氏餘緒的時候，許都空虛。劉備就勸他舉兵襲許，以圖霸業，但他不能用。後來曹操兵遠，始懷悔說：

「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

可見他眼光的狹隘。以這樣無用的人，怎能應付此「天下分裂，日尋干戈」的局勢。故荆

州之失，早在識者意想之中。

至於當時的益州，在愚昧開弱的劉璋主政之下，一味的寬縱弛放，造成豪族把持政治的惡現象，初有張魯的驕恣自大，互相反目；繼有趙韙的稱兵反叛，同室操戈；最後則有龐義李異的特功驕豪，尾大不掉。以致當時賢能之士如法正，張松等莫不心懷外向。益州的不能守，亦早在情理之中。

前面已說過，天下十三州，僅有荊，益兩州尚未劃入曹，孫的勢力範圍內，同時其主均不能守，這真是劉備千載一時的好機會，諸葛亮說他跨荊，據益。以圖後舉的着眼點，即在於此。不過，尚有多數論史的人，以為劉備的退守益州，終嫌偏守一隅，其所以不能成帝業，而僅能造成三國鼎峙的局面，未嘗不由形勢使然。這種說法的是非，可以姑置不談，但昧於當時劉備所處的形勢，以及不察取益州的便宜所在，則可斷言。我們一再說過，劉備在中原從未有立足之地，在徐州而呂布奪之；得豫州而曹操攻之。萬不得已才寄依劉表。這是當時的形勢使然，其次，益州為漢的宗室所有，雖說非有為之主



。但名號所繫，究有無形的影響。劉備既與同宗，同爲帝室之胄，兼以信義之名著於天下，奄取益州，自可事半功倍。何況，益州的重要性，前已說過，未嘗不能爭衡中原，只看八謀如何？

總括上面三點，我們可以看得出諸葛亮的隆中對策是何等的透明利害，深中專理。由於有了他的這個決策作理想的根據，後來才有赤壁之戰與跨據荆，益的實踐。由於理想與實踐的一致，後來才有鼎峙局面的形成。

現在就將這段實踐的經過，作一番概略的敘述。

當諸葛亮出山輔助劉備的第二年（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劉表病卒。曹操的大軍已乘虛而至。劉琮束手請降，劉備尙未獲知。等到曹操的兵已隨境才倉皇出走。過襄陽時，諸葛亮勸劉備返師襲琮，荊州可有，備不從，行到當陽，因人衆輜重過多，兩日僅行十餘里，乃遣關羽帶領一部份兵衆由水道往江陵，以備在那裏會師，到了當陽長坂，操的輕騎已追及，迎戰大敗，只得同着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人狼狽兩走，劉

達漢津與關羽的船隻相遇，始渡河水，同時劉表的長子琦，正做江夏太守，素與劉備，諸葛亮相善，引兵萬餘人來救，遂會同到夏口。但是就軍力說來，還是不能與曹兵相抗衡。情勢非常危殆，於是諸葛亮便主張乞援於東吳。自己親身前往。

當時孫權正擁軍在柴桑（今江西德化縣西南九十里），坐觀成敗，意志未決。亮到就對他說：

「海內大亂，將軍席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劉豫州（備）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曹操芟刈羣雄，略已盡矣，遂破荊州，威震海內，雖有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靡，禍至無日矣！」

孫權反問他說：

「誠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違事之手？」

諸葛亮對道：

「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

於是，孫權勃然道：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

諸葛亮又答道：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

在於今日。」

他們二人的這番談話也可說東吳主奴臣辱的契機，也可說三國鼎足成功的轉捩點，關係非常重大。本來，就當時的情勢來看，劉備新敗之餘，銳氣全消。假若沒有東吳的救援，可以說永無揚眉吐氣之一日，故諸葛亮之行，必求其成功，可是他的說詞處處以共同的利害着眼，並非完全打自己的算盤，所以孫權才能心悅誠服。後來雖有張昭等勸降的餘波，也不能發生作用。何況有識的江左人才如周瑜，魯肅等都所見略同，而加以支持呢？

孫權既決心抗曹，乃派周瑜及程普爲左右都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帶兵三萬人會同劉備並力迎戰取決戰於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魚縣西北江濱。）操軍大敗。所有荊州一帶的佔領地，全部放棄。劉備便收復江南諸郡，以爲立業之基。任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領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在劉備得荊州的第四年（建安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益州的劉璋聽從別駕張松的

勸告，派軍議校尉法正來迎劉備，要他去進擊張魯。他便帶同軍師龐統，及將士數萬人入川。留諸葛亮關羽鎮守荊州，第二年劉璋因為張慮（張松之兄）的密告，殺了張松，並下令守關將士阻止劉軍通過。於是劉備乃從葭萌（今四川臨化縣）回攻劉璋。斬殺璋將楊懷高沛，進據涪城。諸葛亮帶同張飛趙雲沿江西上，與劉備軍會合圍璋于成都，劉璋請降，劉備遂領益州牧。

赤壁之戰，可以說是聯吳攻策的初步成功；荆，益的取得，可以說有了爭衝中原的根據地。這都是隆中對策如響斯應的實現。所謂「英雄造時勢」，此種時勢真是惟有英雄才能造成。動盪的社會，紛亂的政治，錯綜複雜的經濟形態都將為之一變，在軍事方面，由無組織，無計劃的混戰進而為有組織，有計劃的交戰。這具間就不僅單憑戰術與戰略，所有助長戰爭力量的政治，經濟因素都在注意之中；在政治方面，由貪污橫行，吏治不振的局面，變而為三國互相砥礪廉隅，澄清吏治的良好趨勢；在社會經濟方面，由商業資本與地主的交織，進而為地主與士族的結合。商業資本遭逢到此疆彼域的界限而漸趨沒盡。關於此三點，後面皆有所述及，此處不再贅敘。

## 四、武侯的青年生活及其出處

「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實

千歲。」

這是岑參題成都惠陵（劉備陵）祠的詩，他這詩的着眼點，是指明劉備與諸葛亮的結合，爲千古以來君臣遇合的佳話。我們讀誦這首詩之後，都會油然而生嚮往之思。現在先敘述他的青年生活然後再來談他們這段契合的經過：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今山東省境），遠祖諸葛豐在西漢元帝時做過司隸校尉，父名珪，字君貢，做過太山郡丞。很年輕的時候就天逝，所以他幼年就是一個孤兒，他生於東漢靈帝光和四年（西元一八三年）。是時政治不修，天下已亂，當他四歲時，黃巾賊起，四境騷然。從此干戈擾攘，永無寧息。到他十五歲的時候，就跑到豫章去依

附他的叔父，豫竟太守諸葛玄。不久諸葛玄罷官到荊州去依劉表，他也隨同前往。後來他的叔父死去，他便暫時卜居於南陽的鄧縣，即今河南襄陽城西二十里，也就是後來著名的「隆中」。

他在隆中自己耕種田畝，以爲生活。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庶），汝南孟公威等同窗求學，三人都尋章摘句，務求精熟，他則觀其大略，窺其精義。平居常以管，樂自比，時人莫測高深，未嘗相信，獨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相知較深，謂爲比擬相稱。每當清晨月夕常抱膝長吟，並對石、徐、孟三人道：「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反問他的志向，他却笑而不言，後來孟公威懷思鄉里，欲北歸，就就勸他道：「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

當時有一位名士司馬徽對他很賞識，因此就鼓勵他：「以君才當訪明師，益加學問。」他乃去拜鄧玖爲師。關於他的前途如何？曾經一度請教鄧玖說：「操爲國賊，權爲竊命，亮當此亂世，則惟退隱躬耕，養心樂道。」但鄧玖教戒他道：「不然，抱此材器

而不拯救斯民，非仁者之心；然出處必以正。」

由上面這一段，關於他的生活情形的簡略輪廓，就可以窺測出他是一個有大志，但頗能安貧樂道的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用之則行，捨之則藏」的處世方針，也即是他在後來誡子書中所說的：「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脩養方法。所謂澹泊，寧靜，就是清心寡欲，要能清心寡欲，就不能私情俗念所縈繞，才能神專心定以致乎遠，因此在爲學方面才能知其大者遠者，不驚尋章摘句，或致力於干祿的文藝；在爲政方面才能忘小我，全大我，但求有利於國，本身的成敗在所不計，他後來的勞瘁從公，艱辛創業，以致於寫成蜀漢光榮的歷史，這種爲學應世的態度與方法實在有莫大的關係，值得我們再三致意。

正當諸葛亮在隆中度着耕讀的時候，劉備還在奔走四方，尙無立身托命之所，到了最後歸依劉表，而曹操又派兵來襲荊州，幸而已經得了徐庶，才向他推薦諸葛道：「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是劉備曾遇着一位隱士司馬德操，同他談



論過天下的人才，司馬德操就說：「儒生俗世，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劉備追問伏龍，鳳雛爲誰？他說：「諸葛孔明，龐士元也。」由於劉備早就聞名，所以徐庶一提到諸葛，他即請徐庶邀約來相見，可是徐庶却說：「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劉備便親到隆中訪問，一共去了三次才得見面，見面之後劉備就請教道：

「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諸葛亮的答語就是前面錄引的隆中對策，劉備聞聽之後，大加激賞，遂與同歸，情好日密，關羽，張飛頗爲不懌。劉備曾加解釋道：「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由此君臣契合，希世罕見。而彼時的諸葛亮僅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竟能臥致雄主，創立輝煌的事業，豈非千古的奇蹟，前人陳正倫有咏「臥龍岡」詩：

「玄德從茲起臥龍，草廬千古記遺蹤，君臣一語交投厚，宇宙三分割據雄。」

也很難道出當時的情景。

從上面的敘述，我們已可約略窺見諸葛亮立志，修身，爲人的大概，現在就可進一步來討論他的出處問題。

諸葛亮所處的社會是一個動盪不安的社會，政治經濟的糾紛日趨嚴重，凡是有野心的人都可揭竿發難，割地稱雄。士大夫爲利祿所趨不求出處，地主大族爲保障自身利益不惜推波助瀾。在這種是非不彰，義利不明的環境下，要求社會的乂安，惟有揭發精神力量，造成一種向心力，以爲社會的支柱。這種向心力是什麼？就是「興復漢室，統一中國」的目標，要有這個義正詞嚴的目標，才能平抑豪強者的野心，才能激發一般人民的愛國心。但處在那舉世洶洶，混濁難分的時代，有這種抱負，有這種才氣的人就很不罕。如與諸葛亮同密求學的好友，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都被曹操網羅去了，就是一門的弟兄，如諸葛瑾是輔助東吳，諸葛誕是翊贊魏室，惟有他一人看中身無立錐，勢孤寡的劉備，這就是他獨具的興復漢室，統一中國的大志所促成。要不然，以他的才氣

何處不能揚眉吐氣，何處不能聘懷千里，在三國志上裴松之就有一段註釋：

「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聘其龍光，豈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韻，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贊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

他的這一段批評，頗能刻劃出諸葛出山的懷抱。但是有人更進一步認爲諸葛的輔贊昭烈，不只在興復漢室，翊贊宗傑而已；實在是替昭烈創造帝業，另威天下。李岳瑞在他所著的「諸葛武侯」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按侯之擇主而事，不肯屈身魏吳，說者謂其志在翊贊宗傑，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千數百年以來，尙論者莫不首舉此義，幾以爲懸諸日月而不刊矣。雖然，武侯之英略遠志，豈遂如是而已乎。不佞以爲爲此言者，皆經生帖括迂拘之見耳。使武侯

之志而僅若是，則不過一漢末之貞臣而已，何足增民族之光，而於政治界中占千古不祧之地位乎。觀其隆中間對數語，當時漢獻猶爲天下共主，武侯已公然以帝業許蜀烈矣。是知討賊也，興漢也，皆兵家自占地步，以鼓人心之詐亂耳，而武侯之志，固別有在矣。今夫一代之偉人，皆有用人之志，而不屑用於人者也。漢室之亡久矣，曹氏之代漢，無愚智皆知之。然而操之爲人，則予智自雄者也，挾其權術智略，以擄使天下之人材，而不欲有人焉出乎其上者也，使武侯而委贊策名焉，不過如徐元直，孟公威之浮沉開放已耳，甚者且如孔北海之以高才盛名見忌，而至覆其宗，欲求如荀彧董昭輩之許謨帷幄，疏附先後，且不可得。况敢曰出其所舉，以造國利而爲民福也哉。若孫權者殆更下阿瞞數等矣。侯方駿暨視之，將出其緒餘，以應鹿吳會之君臣士庶，而又豈屑與公瑾子敬輩，比肩而立於其朝也。然則舍休休有容，任賢勿貳之昭烈，其又安所依歸，一施其救世安民之大略也耶。裴松之所謂：「魏蜀已翔於遠廓，而羅者猶視於叢澤者，古今之尙論武侯者，亦若是焉已爾。」

其實他這種說法，不過強調譚延亮出山的壯志，並對於劉備的能用人一點加以對比，以明他兩人的結合並非偶然的罷了。要說興復漢室的話，在他自始至終全為戡止託亂之詞，則不敢貿然苟同。固然前面說要安定動亂的社會，需要發揚民衆的向心力。故興復漢室的口號是有針對時弊的作用，這是我們所承認的。但也可以說，這個口號也就是他識見與志向的統一。由於這個統一，目標與事實才能合拍，才能昭天下以大信。所以在《隆中對策》說：「將軍既帝室之胄」，接着說的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並沒有完全以帝業期許的痕跡。直到曹丕篡漢，昭烈踐祚，以及他在出師表中提出的「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才肯定以帝業許蜀，由於他以興復漢室，統一中國為自始至終的職志，殲除國賊的口號才能嚴正的提出，才能激發愛國人民始終如一的正義感。這就是譚延亮一貫的懷抱與識見，也就是他的出處所在。

本來，凡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只應該有一個行使治權的政府，而這個政府無論就歷史，就情理說都是應該擁戴扶翼的。這就是春秋大義所嚴正主持的正統主義。漢代有四

百多年的光榮歷史，雖然末葉政治不清明，但這是由於宦官外戚的專擅朝政，後來又遇着董卓，曹操等的專權，以致太阿倒持，政不由己，就情理說，還是值得緣情加以寬宥的。所以襄贊曹操，功勳最大的荀彧，也還有維護正統的觀念，何況未出山時就認「操爲國賊，權爲竊命」的諸葛亮，自然能夠判別主從之分，而「出處必以正」。其實，凡是有愛國心，有正義感的人，處在國家崩分離析的時候，都應該一致的維護正統的政府，來爬梳政治，以收拾人心。假若只爲個人的私利，少數人的權益，就不惜斲傷國脈，置多數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雖自命有多少人的羣衆，假託多少花言巧語的說詞，終必時間所揭穿，爲多數人民所唾棄。要不然，任何的個人都可稱王稱帝，國家怎有統一，怎有進步。諸葛亮不過是一個書生，但他早就有這種救國救民的大志，故劉備雖處艱沛抗讓的苦境，他還是捨身相從，不計利害。所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要是志向遊移，毫無識見的人，怎能從危局中建造新場面，使我們後人有無限的景仰和真誠的膜拜呢！

結  
事  
亮

與  
六

## 五、漢代學術的演變及其思想

歷來的文人對於諸心亮的思想根源，各有各的考據與看法，以致攪弄得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現在擬先將中國的學術到東漢時演變的情況作一番鳥瞰，然後再來推究他思想的淵源。

學術是時代的反映，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尤其是在社會紛擾，或政治黑暗時期，文人才士懲艾當將的現象，憧憬着理想的將來，往往提出一種迥異的主張與看法，自成一家之說。由於立足點之差異，各種學說應世的政見就大不相同，互為攻訐，互相詰難，所謂「真理愈辯愈明」，學術的進步與發揚，肇端於此。我國的戰國時代是一個社會紛爭的時代，各種學說的興起有如瓊花異卉，鬥奇爭妍；故有人比喻為歐州中古的文藝復興時期。雖為各種學說踴異軍突起，儒家已不能控制整個的思想界，故孟子有邪說異端



橫行的慨歎。到戰國末期諸子百家的學說已蔚成大觀，影響當時的思想界甚鉅。秦統一中國，就來一次大反動，焚書坑儒，鉗制思想，學術的進步戛然中斷。西漢初葉承秦苛政之餘，主政者來一套無爲而治的黃老治術，研究老莊的風尙大盛。中葉以後崇尚儒術，鑽研孔學，又成爲登庸仕進的途徑，「天下學士，靡然鄉風」。東漢繼興，儒學大盛，士人子弟從大師求學者爲數極夥，如後漢書所載：「張興著錄且萬人，牟長前後萬人，蔡玄萬六千人，樓望九千餘人，宋登數千人，姜肱三千餘人，曹增三千人，楊倫，杜撫，張玄皆千餘人。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鄭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到了後漢末季游學至太學的有三萬餘人。

照前面學術的盈虛消長情形來看，似乎有漢一代仍是儒學高着極大的優勢，不錯的，的確儒學在表面上仍爲多數學者所宗。但是，由於社會，政治情勢的日新月異，當時的儒家思想已揉雜黃老及法家的思想在內，如西漢的賈誼就有莊子的出世思想，在他的  
服賦中說：

「乘流則逝兮得抵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逝。」

這顯然有道家思想的氣氛，再如董仲舒，劉向劉歆父子都可算西漢有名的大儒，可是他們的災異學說就擁抱方士陰陽五行之論，以致爲後來緯識盛行的濫觴。到了東漢，如融通「古文經」，「今文經」的鄭玄也還是以緯注經，溝通識緯與經書的關係，也還是有陰陽五行的氣息。以上是就儒道互通的情形約略說及。再來看與儒家絕對相對，站立敵對地位的法家也有時爲儒家所引用，尤其是在社會紛亂，官常敗壞的時代。這種情形在東漢時最爲顯著，如王符的潛夫論雖崇尚德化，却公開的承認法令的重要性，他說：

「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

「嚴者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

法家特長就在他的語言中也主張德刑並用，他說：

五、漢代學術的演變及其風潮

「據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

但是對東漢末季的社會則建議以刑罰爲主，故他又說：

「至於革命之運期，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

這也可看儒法合流的痕跡。至於其他如墨家，名家在有形無形之間也有多少被採用的

前面是以儒爲經，以其他各家爲緯來觀察互相擁抱的踪跡。現在擬再以道家爲主，來看與各家的關係怎樣？司馬談是道家的人，他對於道家自然是尊崇，可是他的尊崇就由於道家能「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所以他在六家要指中說：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

這是他以爲儒家可取的地方。

「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

這是墨家的長處。

「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這是法家的優點所在。

「若夫控 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這是名家的特點。

雖然司馬談的說法並不能代表整個道家的意見，但是這種持平，折衷的主張，實在有相當的理由。因為時代是推移的，社會是變化的，要應付這變動的時間，空間，一定不能「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據，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一定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因此各有特長，各有見地的學說應該互取所長，以補所短。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文化進步的趨向。

上面所敘述的是兩漢時代學術思想演變的軌跡，但由於學術與政治，經濟是互為表裏，互相為用的。所以政治，經濟方面的變動也就可影響學術的進展。東漢初葉，因為**漢武**推崇儒家，尊崇經術，士子文人多以通經致用為做官的補階。桓靈以後，政治不

講。乃有燕鑄的興起。於是多數儒生更惟有從事於調話之學，往往一字訓釋，連篇累牘。所謂「單辭碎義，博而寡要」，不能施諸實用，反將脩身治國的學問置之腦後。同時，當時的大族子弟已與生產勞動分離，這因為土地集中與商品生產發達的結果，不必要他們參加生產的過程。從而他們可以專心竭慮於干祿的文藝，對於實際的學問更加隔膜，誠如漢書藝文志所說：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這是當時最佔優勢的儒生研究學問的行徑，往往養成抱殘守缺，不識大義，不識大體的政客與官僚，東漢末季的政治昏暗，是非不明，王綱不振，這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關於西漢東漢學術的演變以及東漢末季士人的風尚已如上述，現在就進而研究諸葛

## 蔣的思想系統。

先就他爲學的情形來看，他還是照古人爲學的前例，半耕半讀，所以很能了解稼穡的艱難，以至於民間的疾苦。同時他爲學的方法是「觀其大略」，與當時「務爲精熟」的咬文嚼字，迥然不同。這種出類拔萃的爲學情形，在當時已可稱爲空谷足音。我們對於他自然不能用一般人的衡度來評量。再說他平常均以管，樂自許，而管仲是佐齊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的大政治家，樂毅是爲燕攻齊連下七十餘城的名將。要一身兼文治武功的極頂，絕不是守一隅之見，抱一枝之長的人所能肩負。所以蔣諸葛亮硬派入那於派，那於家，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看法。後面我們再舉數條事實以爲例證：

1. 就諸葛亮的出處及節操來說，他擁護正統，匡復漢祚的苦心孤詣，純是儒家的春秋大義。後來昭烈臨終托孤時，他涕泣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大義所在，生死與之的精神。此外還有一段事實足以證明他忠義凜然，杖道關邪的儒家作風。在劉禪登基的建興元年，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

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這批魏國有名的文人分別的寫信給他，陳述天命人事的趨向及形勢，勸蜀舉國稱藩。他雖不直接復信，但却作了一篇文章名為「正議」，以作答辯，文詞是：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諫稱莽之功，亦將信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述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謫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教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威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頽勢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

這篇文章真是義正辭嚴，理直氣壯，既以項羽，王莽擬曹魏，而蜀漢則以唐帝，禹稷自

版。名正則言順，言順則無事不成。蜀雖較弱，有此正統的名份，自可以精神力最感在一切。這是儒家仗道關邪的一貫作風，故一則曰「起不由德」，再則曰「繼之以篡」，春秋史筆，不過如此。無怪聖人之徒的朱熹就曾稱讚道：「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蔣葛孔明」。所以將他歸入儒家，的確有相當的理由。

但是就他的學養來看，也的確有法家、道家的烙印。如劉備遺詔後主有曰：「可讀漢書、禮記，闕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遑遺亡，可自更求。」申不害，韓非，管子都是有名的法家，他既然親自寫過這類的書，不用說是有相當的研究，何況他平常又以管樂自比呢。至于六韜一書相傳爲太公所撰，一般人將他算作兵家。可是漢書藝文志上却將他列入道家，并有一段注解：呂望爲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爲術者，所增加也」。其實兵家與道家原是氣息相通的，如兵家所講的權謀，就與道家主張的「以靜制動」，「知黑守白」的原理契合，再加陳勝五刑的辨認，也是道家所着重的修養。因此有許多道家也可列入兵家。舉例



說，陰符經相傳的是舊題黃帝撰的一種遺本，一般公認爲道家的書。朱熹就說過：「其中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注釋的人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峯等人。在諸葛亮集中也有陰符經序及陰符經注論兩種遺文。是否假託偽造，固不可考。但是我們看內中注釋的人多數也可列入兵家，就是撰書的黃帝也是兵，道兩家俱可歸入的人。爲甚麼偽造的人，要將他們牽扯進去呢？這其中的蛛絲馬跡，自然就是全面所說的兵，道兩家聲息相通的原故。何況太公既是道家，他所著的書自然也可算道家的書。漢書藝文志就將他的著作通列在道家一類中。同時，我們還可以得到一種反證，就是歷史上善於用兵而深曉策謀的人，多數都是直接間接與道家有淵源的人，其他如儒家，法家真是絕無僅有，所以說諸葛亮在學養上也有道家的成份在內，並非架空捏造的說法。

再就他的治術來看也可說集各家之所長，如「以猛濟寬」這本是法家的作風。但「開誠心，佈公道」却是儒家的氣派。又如「循名責實」這是名家的主旨，而節用恤民，物理

其本則有墨家的氣派。

總而言之，諸葛亮是一個希世的人才，是一個非常的政治家與軍事家。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可以說古今很少其匹。因此，我們不能抱一隅之見，囿一家之言，來作管窺；更不可先具成見，故造藩籬來橫加指責。其實，就我們前面所述及的學術的演變情形來說，原來的道，法，儒三家經過時代的益深，陣容已不怎樣嚴整，這就是說互相都有滲透的趨勢，如司馬遷的史記中就說申不害，韓非諸人皆學本黃老，前面所說的司馬談更將各家都歸併於道家。這都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與學術互相投射，互相影響的結果。諸葛亮是聰明透頂的人，自然是能夠按古索今，審時度勢來作學術的研究，以備將來經世致用。所以，諸葛亮的兼總各家之長也是學術的演變所造成。我覺得杜甫的「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的詩句，倒能提示出諸葛亮的長處，因為他的的確確是併伊，呂，蕭，曹於一身。關於這一點，將來談到他的政績與用人等時，再作補充的證明。

晴  
萬  
亮

五  
八

## 六、偉大的軍事天才

「草廬當日樓桑，任虎戰中原，龍臥南陽。八陣圖成，三分鼎峙，萬古塵揚。

出師表謀謨廟堂，梁父吟感歎巖廊，成敗難量？五丈秋風，落日蒼茫！」

這是元人鮮於必仁詠諸葛亮的折桂令詞，這首詞的意義當然是褒崇，而沒有貶損。

可是「成敗難量」四字對於身統戎旅，抱攘姦除凶，興復漢室的壯志，而又是偉大軍事家的武侯，確有莫大的影響，以至抹殺其必成之志與必成的計劃與準備。進而減少他在軍事上的聲光。由於成敗論的推演，就無形中發生許多說他非將才，以至軍略有錯誤的論調。如編撰三國志的陳壽在諸葛亮傳的評語中，就說：

「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

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韓信，城父，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陳壽说他奇謀與將略非所長，就含有成敗的戒見。其他如「或值人傑」，及「天命有歸」，不用說是敷衍晉室的話。因為陳壽在晉做着作郎，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他的論評並非公允的說法。至於蘇轍在「三國論」一文中論及劉備的缺陷時，就說：「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這也是勸襲陳壽的說法而加以強調，更不能作為準繩。

除了批評他的將才外有進而檢討他的軍略的。如蘇轍對「棄中原而入巴蜀」一點認為是不能爭衡中原的敗着所在。王船山在讀通鑑論中則對於他的隆中對策的軍略，認為輕重倒置。他說：

「以形勢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眾出秦川，而

命將向宛雒，失輕重矣。」

接着他又以爲「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諸葛繞山而西，出祁山，趨秦隴，奇兵也。」他這種批評，近來也有很多人附合，也說得振振有詞。

由上面的說法，諸葛亮到底是不是一個十全的軍事家？頗使人懷疑了。現在我們先將他用兵的史實作一番敘述，然後再從各方面來辨正，來剖白，以便獲得一個正確的論斷。同時可以證明他確是一個卓越的軍事天才。

自從劉備跨荆豫益的理想實現了以後，他已經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了。但是，荆州是東吳的門戶，管鑰長江的咽喉，爲孫權所必爭。故在建安二十年（西元二一五年）孫權就派諸葛瑾來索取荆州，劉備未允。因爲荆州不只是東吳的門戶，也是西蜀的出口，關係也很重要。在這兩方共同爭奪的情形下，荆州必然要成爲兩方戰爭的導火線。果然，孫權忿恨劉備不還荆州，乃派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恰切這個時候曹操正進軍漢中，迫走張魯。而漢中是蜀國北部的屏障，爲進軍中原，爭衝天下的要道。量衡輕

重，爲免腹背受敵，劉備遂與孫權講和，平分荊州，以涇水爲界，江夏，長沙，桂陽以東屬孫，南部，零陵以西屬劉。兩方的戰爭才緩和下來，劉備方無東顧之處，方能悉心經營北方，故在曹操進位魏王的建安二十一年（西元二一六年），劉備就進兵攻漢中，相持至建安二十四年（西元二一九年），兩軍會戰於定軍山，黃忠大破曹軍，並斬殺了大將夏侯淵。漢中遂爲劉備所有，羣上共推他爲漢中王，同時，在荊州方面，關羽樊城一戰，斬龐德，囚于禁，敗曹仁，將曹操的南邊防線整個突破，使其根本動搖，曹操的部下遂有建議遷都之說。

截至上述的事跡爲止，這個時期可說是劉備的極盛時期，也可說諸葛亮隆中對策的軍略逐步實現的時期。假使不是半途出了岔子，真可做到東下與北上的鉗形攻擊，可是荊州是東吳朝夕窺伺的目標，荊州不得，東吳難安枕席，所以隆中對策內就說過「外結好孫權」，用意也就是在保持荊州。無如國與國間自有其利害打算，當關羽未進軍樊城之前，呂蒙就會獻策於孫權道：

「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士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可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

可見東吳對於荊州是夙具必得之心。到了關羽進圍襄樊的時候，全琮也上疏孫權，「陳羽可討之計」。由此更可見他們君臣的處心積慮，所以關羽的覆敗，自有其原因。有些人謂孔明對荊州，「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其實也不盡然，因為在劉備羽毛未豐的時候，東吳讓他佔據荊州尚無所謂；到了取得益州，進佔漢中之時，劉備已駸駸然成一大勢力，東吳與西蜀究係敵體的兩個國家，斷不能讓自己的咽喉老是爲人扼住，更不能一隻強有力的手所扼住。就是讓劉備來守荊州，恐怕也不免衝突。同時，我們盱衡三國的局勢，東吳自始至終都沒有統一中國的大志與大作風，她只是在三國錯綜牽制的關係中來求保存江左，或者偷空撻點小利益。所以在早魯肅就對孫權說過「鼎足江東」，諸葛亮請他援助劉備共拒曹操時也說「鼎足之形成矣」。假若他果早有龍驤虎視的野心



，對於這種三國鼎峙的話絕對聽不進去。由於此種關係，他就不能不隨時保持一種均勢，換句話說，他既不能讓曹操有傾覆西蜀的可能，也不能讓劉備有佔據整個中原的可能。因此得這一點不惟是襲取荆州的動機之一，也是整個聯吳外交難於始終無間的契機所在。關於孫權這種培植劉備以自重的趨向，在曹操那邊也有人識破，當曹操攻荊州，劉備奔吳求援，就有人說，孫權必殺備，但是程昱說：

「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解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

這種情勢，曹魏的有識者都能先知，難道濟濟多士的江東就不能觀患於未然。固然他的力量在當時拒魏似不足，但後來劉備初領荊州牧時，以東吳的力量對付之尙有餘。難道他不知道劉備是人傑不可假以雲雨嗎？這又不然。因爲他早已明知以他的才智及力量絕不能剷除曹操，所以他曾經寫信給曹操說：「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若提攜劉備起來

，以吳蜀的力量來拒魏，則可高枕無憂。這一點是孫權使劉備能夠暫時駐足荊州的原因，也是吳蜀的同盟有時雖斷而終能締成的關鍵所在。諸葛亮以出秦川爲正兵，而以爭襄樊，出宛洛爲奇兵，未始不含有避免東吳的嫉視，甚而引起爭端的苦心。歸總的說，荊州的不能久守，有其必然的原因，絕不能責備諸葛亮的能得不得用。何況與劉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的關羽，又非他所能指揮裕如呢？

荊州既是吳、蜀相爭的導火線，加以關羽的剛愎自用，不善調處，以致引起孫權的忌嫉和不滿，蜀志關羽傳注引典略云：

羽驕，權遣使求助之，敕使草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己得於禁等，乃罵曰：

「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又蜀志關羽傳載有：「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這些連貫

的不愉快的事件，已使東吳大不高興，何況那時的關羽正是威震華夏，勢力駁駁日上的時，自然更容易引起孫權的疑忌。司馬懿、蔣濟、就看清了這其中的機括，故對曹操獻策道：

「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果然的正合孫權的心意，便派呂蒙襲關羽，關羽敗走麥城，和其子關平同時遇害。由於這一次吳、蜀的構隙，就演成下一幕吳、蜀的大火併。

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年）曹操病逝，子曹丕繼承，擅稱皇帝，蜀中傳聞獻帝遇害，劉備聽從諸葛亮等的促請，於建安二十六年（西元二二一年）即皇帝位。任諸葛亮為丞相，同年六月劉備親率諸軍伐吳為關羽報仇。孫權曾來書請和，不允，趙雲諫阻道：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死，子丕篡盜，當因

衆心早闕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出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

秦宓也說「天時必無其利」，都未蒙聽從，決意東征，結果大敗而歸，軍中精銳，損失殆盡，諸葛亮北伐之師其所以遲遲不發，以至於終難成功，這也是一個大原因。假若劉備沒有這一次的大失敗，統率蜀中勁旅，照趙雲的主張，進據關中，直搗中原，則重興漢祚，混一六合，或者就有可能，也不讓諸葛亮後來六出祁山，與魏苦苦爭衡了。關於此事，或者有人要說諸葛亮何以不力加勸阻？照我們的推測，當時的情勢，是劉備抱定東征的決心，諸葛亮雖勸阻亦不可能；要不然，在先主兵敗歸來，他不必說：「孝直（法正）若在，必能阻主上東行矣。」其實，劉備這種不顧大局的伐吳一舉，就是魏國方面也是有人預先見到，而加以認定的，魏志劉曄傳上記載有：

「黃初元年（西元二二〇年）以曄爲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今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

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

所以東征之舉，也是爲諸葛亮始料所不及。虧兵折將，有損軍威且不說，最可惜的是籌劃很久的鉗形功勢，由於與東吳交兵這一段裂痕，使西蜀的軍力不能跨過荊州，而爭襄樊，不啻兩鉗中失去一鉗。其後之不能再沿江東下，而只能北趨關中，導因在此。

章武三年（西元二二三年）春劉備在永安（今四川奉節縣）行宮病篤，託孤於諸葛亮。建興元年（西元二二三年）封亮武鄉侯，領益州牧，三年（西元二二五年）綏靖南疆，五年（西元二二七年）親率軍旅大舉北伐，進駐漢中，這就是有名的一六出祁山的開始。臨行之前上疏與後主，除陳述當時的情勢並治國的要道外，並提出他興復漢室，統一中國的決心，原疏如左：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

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竊來二十

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滬，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這就是膾炙人口，傳誦不絕的出師表，文氣的光昌弘偉，以及謀國之蓋壽，北伐之決，均洋溢於字裏行間。表上後，他即進駐河北陽平（陽平關，今陝西沔縣），準備北伐。丞相司馬魏延獻計道：

「聞夏侯懔，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懔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臣

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黃門郎開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

武侯以爲此計危險，不如坦道進攻，可以平取隴右，十全而無一虞，故未加採用。接着就揚言將出斜谷（今陝西郿縣西南），逕取魏都，派將軍趙雲鄧芝爲疑兵據箕谷（今陝西褒城縣），他自己統率大軍，進攻祁山（今甘肅西和縣）。戎陣整齊，號令嚴明。魏國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都舉兵響應，關中爲之震動。魏主叡命將軍張郃領兵迎戰。武侯使馬謖爲先鋒，與張郃會戰於街亭（今甘肅秦安縣東北），謖違節度，駐軍於祁陵，被魏軍斷絕水道，蜀軍慌亂，遂致大敗，於是武侯只得退兵，並遷徙西縣（甘肅天水縣）千餘家還漢中，下馬謖於獄處死；同時據箕谷的蜀軍亦因衆寡不敵爲魏將曹真所敗，但因趙雲斂衆自守，主力未大傷，武侯爲明責任起見乃自請貶責。上書於後主道：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調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後主遂以武侯爲右將軍，行丞相事。這就是第一次北伐的經過。

同年（建興六年，西元二二八年）冬天，魏大將軍曹休率領十萬大兵伐吳，大敗於石亭（今安徽潛山），諸葛亮見魏吳交戰，關中空虛，乃乘機北伐，引兵出散關（陝西寶雞縣西南），圍陳倉（陝西寶雞縣）。圍攻二十餘日，蜀軍糧盡退還，魏將王雙來追，蜀兵返道迎戰，斬王雙，魏軍敗退。這是第二次北伐的經過。（現在所傳蜀的後出師表，就發生於此時，但據前人及近人的辨證，確定其爲偽造，故不再錄列。）

3. 翌年（建興七年，西元二二九年）春天，武侯派部將陳式進攻武都（甘肅成縣），陰平（甘肅文縣），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來救。武侯親率大軍趕到，戰於建威，郭淮敗逃。遂收復武都，陰平兩郡，事後僚友都向他道賀，他却愀然道：

「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物，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

可見他真有拯救新民於水火的素志。後主以武侯克復有功，詔復丞相位。這是第三次北伐的經過。

4. 建興八年（西元二三〇年），魏大司馬曹真以蜀兵數入寇，由斜谷進軍攻蜀，魏主命司馬懿向西城，張郃由子午，諸路並進攻漢中，武侯聞訊，親率大軍駐屯城固赤坂，嚴陣以待，另遣李嚴領兵二萬守鎮漢中，適值天雨三十餘日，道路泥濘，軍行困難，魏主納陳羣，華歆，楊阜，王肅等的諫阻，遂詔曹真班師。武侯亦未追迫，僅派魏延入西羌，擊敗魏將郭淮於陽谿，這是第四次北伐的經過。

建興九年（西元二三一年），諸葛亮親率大軍圍攻祁山。其時，魏主命司馬懿屯長安代曹真，聞蜀軍北來的消息，司馬懿乃留費禕，戴陵守上邽（甘肅天水縣），自領大軍往救祁山。但武侯却分兵攻祁山，自領軍攻上邽，敗郭淮，費禕之兵。並派兵割麥，以充軍實。司馬懿聞敗來救，兩軍相遇於上邽之東，司馬懿飲軍據險，不敢出戰。武侯乃引兵稍退，魏兵追至，相遇於鹵城（甘肅伏黨縣），司馬懿又登山掘營，不肯交戰，魏將紛

紛請戰，均不許，於是諸將憤極說道：「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司馬懿亦以為懼，乃分兵兩路進攻，武侯派魏延、高翔、吳班迎戰，大破魏軍。斬殺三千餘人，虜獲戰具無數，司馬懿敗退還，從此再不敢出兵交戰。但蜀兵以糧草雖有木牛運濟，終以不敷食用引軍還，司馬懿令張郃追擊，進至木門，蜀兵依高設伏，萬弩齊發，張郃中流矢而死，魏兵退走，這是第五次北伐的經過。

建興十二年（西元二三四年），諸葛亮親領大軍十萬，繼續北伐，同時遣使約吳，東西夾攻。蜀兵出斜谷，直趨渭河南岸，駐紮郿郡，司馬懿見蜀兵至，也就引兵渡渭，背水為陣，以便抗拒。武侯却引兵進據五丈原（陝西郿縣西南），分兵屯田，以為久遠之計，耕者多雜居於渭濱居民之間，但是百姓安堵如恆。此時，蜀兵雖長安，不過二百餘里，勢氣壯盛，魏主惟恐司馬懿兵力單薄，派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相助，並敕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司馬懿鑒於前次的失敗，自然一意堅守，武侯多方挑戰，也不理會。派人送婦女的衣飾給他，譏笑他雌伏，他也不以為恥。更進一步為防備諸將的求戰起見，

表面上曹魏主請戰，暗地却請魏主派大臣持節來制止。姜維不問究竟會對武侯說：「辛佐治（名毗，魏主徇司馬懿之請，派來監軍的人）杖節而來，賊不復出矣」。武侯乃分析給他聽道：「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魏兵既持堅守的決心，戰局遂演變為相持狀態。如此相拒百餘日，武侯已漸病困，而仍力疾治軍，不稍鬆弛。終於長眠不起，病逝軍中，司馬懿聽到蜀軍忽然撤退的消息，便引兵來追，但蜀兵反旂鳴鼓，返兵相向，司馬懿大恐，不敢再追。到了蜀兵徐徐退入谷中，正式發表以後，司馬懿才引兵追趕，已來不及了。只看見蜀軍防地的遺跡，都是整齊嚴肅，未嘗混亂，他由不得衷心佩服地嘆道：「天下奇才也！」這是第六次北伐，也是諸葛亮最後一次北伐的經過。

前後六次北伐的經過，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就戰略及戰術兩方面來加以檢討。

先就戰略說，出荊州，爭宛洛與出秦川，窺關中，本來是蜀伐魏的兩條進兵路線。但是，荊州為東吳必爭之地，前面已言過，此處不必再談。現在僅就這兩條路線在戰略

上說究竟誰佔優勢來以一番比較。就形勢說，出荊州，沿江東下，自然是輕而易舉；出秦川，山路跋涉，自然是比較艱難。可是宛洛爲四戰之地，可攻而不可守；關中有高屋建瓴之勢，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我們再就歷史來看，渡江東下成功的，就只王濬樓船和平吳。但那時的晉國早據中原，西蜀已無北顧之憂，故可率爾浮江東下。相反的說守蜀以及由蜀而進窺中原，必先據秦隴，以爲輔車之勢，南宋吳玠吳玠兄弟就是駐軍川陝，抵抗金人的南犯，建立了興復救亡的功蹟，張浚也治兵漢中，抵禦金兵，他就認爲守蜀當從保衛關陝起；號令中原，也必以漢中爲根據地。還有楚漢相爭的時候，韓信也是由米倉道經漢中，下陳倉而定三秦。再就人心的向背來說，關中爲劉邦起事的主要根據地，人有思漢之心。劉備又爲漢室苗裔，領兵北上，誠如趙雲所說，「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所以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而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就舉兵響應，後來街亭兵敗，願意隨蜀遷徙的就有千餘家，到了第六次出祁山屯田渭濱之時，所謂軍民相安堵，閭里不驚，這一方面固然是武侯治軍的嚴肅有方；一方面也是人民的衷心愛戴。

，才能做到軍民合作，打成一片的景象。最後說到運輸情形，當然是出荊州來得便利，但是當時的隆中對策明明是以出荊州與出秦川相輔而行，這就由於運輸方面有漢水的貫通，漢中與上庸（今陝西山陽縣），襄陽可以假舟楫之便以爲接濟，後來荊州失守，襄陽在曹操之手，駐有重兵；江陵在東吳之手，亦步步設防，出長江，爭宛洛，已不可能。就運輸說自然也受大影響，故武侯的幾次北伐也可說完全因爲軍糧的不能解決而撤退。但是就戰爭的技術而論他已經做到可能做到的能事。茲再詳敘如左：

在一般討論戰略的名著中，我們可以看到「攻」與「守」是互相爲用的。唐太宗就說過：「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這是說明攻與守是互相聯絡的戰鬥行爲，不可分離的。但是戰爭的目的主要任取得勝利，因此在目的上攻與守就有軒輊之分，故李靖說：「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這即是指明攻擊才是戰爭中主要的動作，而守禦不過是補助攻擊的一種手段。由此說來，一般人認定武侯的「以攻爲守」，也只見到戰略的一面。其實他的用兵的動機與佈署以及他必成之志，絕不是只圖固守一隅，長此終老

了事，看他第一次出祁山的時候，魏國方面根本沒有準備，這就是他看到有可乘之機。他派趙雲出箕谷，而自己領大軍迂迴出祁山，越秦嶺，以居高臨下之勢，直趨長安，也可說很奇妙的錯形攻勢，要不是街亭的挫折，其成就是難於估量的。再說他果真以攻爲守，何必在同一年中用兵兩次，（第一，二次北伐），也用不着在冬末剛出兵，翌年春天又出兵（第三次），這不是正中了他人批評的話：「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了嗎？所以，我們認爲他是真有長趨祁山，飲馬河洛之志，斷非純是以攻爲守，而是以攻擊爲主要的手段與目的。

進兵路線既相當正確，同時又有以攻擊取勝的目的與手段，爲甚麼武侯始終沒有成功？這其中的原因，也可以指出兩點來：（一）是攻，防兩方本身的功能問題；（二）是前面所提到的運輸問題。

所謂攻，防本身的功能問題，是先假定敵對的雙方主帥有相等，至少相差不大的才

力以及兵力相埒的條件，那麼，防守比較佔優勢。所以克勞塞維次在他的大著戰爭論上說：

「防禦之目的爲何？在乎維持現狀耳。原來守較取爲容易，蓋攻守兩者所有手段爲同一之時，則通常防禦較易於攻擊。然而維持現狀何以爲容易，以攻者所徒費之時間，悉爲防者之利益也。防者自能不播種而有意外之收穫，由於攻者誤認，恐怖，怠慢等之一切躊躇，防者均可因之而生有利之結果。……此外專就戰爭之性質言，亦爲本來所有之利益，是蓋因防禦者特能利用地形爲援助也。」

防守既有上述的利益，加上司馬懿也是當時將兵的翹楚，兵力的數量也相當的龐大。所以專以攻擊爲主的武侯是頗難施展裕如的。但是就在此種攻守殊懸，強弱異體的局面下，他還是表現許多驚人的傑作。如斬王雙，敗郭淮，殺張郃，拔武都，陰平二郡以爲蜀國北方的屏障，最主要的是使長於用兵的司馬懿終生畏蜀如虎，只能作消極的抵抗，而不作積極的進攻。在戰略上說來，司馬懿已犯了攻守不能同一的錯誤，就戰術上說



來，有防守而無攻擊已失去了防守的意義。因爲「防禦是在借優勝的餘威，以移於攻擊之先，爲求獲得勝利之手段」（見戰爭論）。假若天假武侯以年，規復中原的壯志定可獲伸，就是東吳的大鴻臚張儼在他所著的默記中也有一段公允的看法，他說：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洲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井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忘，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與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

次就運輸問題來談，我們知道武侯也是表現了不少天才的。如木牛，流馬的發明，可以概見一斑，但在戰略上來說，最好的辦法是「因糧於敵」，以免飛芻橐粟之苦，孫子兵法上就說：「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芻秣（馬的草料）一石，當吾二十石」。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有攻佔敵人的資源要地。故克勞塞維次在戰爭論中將

「佔領攻擊用的物質諸要素，更佔領其他成爲敵軍生存要因的東西」列爲戰爭目的之一，並主張：「爲着奪取物質的諸種力量之故，應該將作戰指向這些資源主要地集中的重要城市，軍械庫，重要要塞等等」。現在我們來分析武侯的六次伐魏，除第四次屬於待敵的性質，不加論列外，第一，第三，第五共三次出祁山，其餘第二，第六兩次係由今陝西，直趨渭水之濱。一般人所謂的六出祁山，實在只有三次。但不管出祁山也好，或趨渭水也好，他的作戰重心似皆側重於農產地，以便取獲糧秣。因爲出甘肅南部，進而據有洮河流域及渭水上流，有就地取食之利。魏志載夏侯淵征涼州，廣收糧穀。張既爲雍州刺史，徙氏民北就穀於扶風天水界。又晉書高祖宣帝（司馬懿）紀載有「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由此可見武侯的三次出祁山，不僅有軍事上的作用，而且有經濟上的作用。至於第二，第六兩次係由斜谷（即褒斜道）進軍，直趨渭水南岸。第二次的主要目標是陳倉，也是軍事上，經濟上的要地。由於曹真的先事防範，派將軍郝昭，王生駐守，繕治城池，故不能拔。第六次北伐對於軍精的籌劃更爲周密，事先陸續運

糧屯於斜谷口，俟準備充足，才開始通兵，一進兵就先佔據渭水南岸，以便就地取食。晉書上載：「諸將欲駐渭北以待之，帝（司馬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足見渭南軍食的豐裕，但武侯仍恐長久之後不敷食用，又實行分兵屯田辦法，以爲「久駐之基」。統觀他前後的措施，真可說對於軍糧問題費盡苦心，到了漸能解決的時候，竟與世長辭，讀史至此沒有人不爲之浩歎！但他的軍事天才不能因爲他實志以歿而加以否認的。

最後，談到他不進兵子午谷問題。我們知道從漢中北伐的路線共有三條，一曰僞略道，長四百二十五里，其中道路屈曲者八十里，凡八十四盤，行旅視爲畏途，後曹爽攻蜀卽由此道，結果是進去時，「牛馬驟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退回時，被「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連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欲，而關右悉虛耗矣。」這是由此道出兵的故事。二曰子午道，最近長安，然谷長六百六十里，曹爽卽由此道以攻蜀，當時魏國的許多大臣就向魏主紛紛諫阻，說得最剴切明白的是散騎

常侍王肅的奏疏，內中有幾句話：

「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

結果，曹真是無功而還。三曰褒斜道，谷長五百里，武侯第二次出散關，圍陳倉；第六次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相持於渭南，大約就是從此道進兵。就地形的便宜說來，褒斜道似較儻略及子午道爲容易。因爲漢水上流是一個盆地，秦嶺爲漢水和渭水的分水嶺，分水嶺的水分別流入渭水與漢水，形成許多的谷，沿谷開闢了許多小路，這就是當時南北往來的孔道。子午道是最接近長安的路綫；但是由盆的尾部翻山而上，自然陡險不易；儻略道是由盆的膝部翻越而到整屋縣，情形也比較艱難；褒斜道是由盆的腰部翻過盆邊，故較爲容易。同時，道內有漢水支流——褒水並道而馳，所謂「由斜谷出，以流

馬運」的流馬，想來就是在漢水及其支流中運糧的船舶。至於出祁山，乃是先翻過比較平坦的分水嶺，以居高臨下之勢，直趨長安。武侯所謂「十全而必克」以及「懿子午谷爲懸危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何況長安爲魏國重鎮，萬一有重兵駐守，魏延豈不進退失據，以至全軍覆沒。所以說出子午是正兵，亦非的論。

此外，我們再來談談武侯治兵的情形。根據各方面的記載，他治兵的成績可以說世無雙。就兵的行動說是：「止如山，進退如風」；就兵的戰鬥性說是：「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就用兵的威信說是：「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就士兵的技術說是：「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者數十萬之功」；就軍風紀說是：「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就工事及內務方面說是：「營壘，井竈，圍濶，藩籬，障塞皆應繩墨」。所有這些條件都是治兵者所難能，而更不易兼長的。楊龜山認爲：「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並非過譽之詞。

概括前後所述之看來，諸葛亮的將才與軍略均無可詆議。假若他不死，定可完成他

興復漢室的始願。我們既不可以「失敗論英雄」，更不可以他生前未能統一中國，而認為他只有造成鼎足三分的才智。陳同甫的「酌古論」中就說：「孔明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接着他又在比較武侯與司馬懿的用兵優劣時強調武侯不死，統一大志定可完成道：

「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彼豈孔明敵哉！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飢退，晚年雜耕渭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于戰，戰之則敗耳。」

一戰而敗，則掩有中原，統一華夏的大業，必可順利完成。元人鄭元祐有「武侯像」詩，頗能道出他的知遇，懷抱，及軍事才能，茲錄列於左，借作本章的結尾：

「魚水君臣百世師，風雲魚鳥識旌旗，三分天下何經意，恨未中原復本支！」

諸葛亮

八六

## 七、聯吳與平蠻

聯吳與平蠻是武侯偉大軍事策劃中的雙翼，在他的隆中對策裏面早已確定，就積極性方面說：聯吳是在取得外援，平蠻是在擴充兵力及資源；就消極性方面說：聯吳是在減少東顧之憂，平蠻是在根除家門之禍。要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目的都能同時並舉，那麼他北定中原的壯志才有實現的保障。以下將分別的加以檢討。

關於聯吳的經過情形，截至昭烈死時為止，前面已有敘述。我們就所敘述的史實來重加評斷，認為早期的聯吳政策是相當成功的，所以才能達到借荊州、取益州的成果，西蜀才有立足之地。中期是失敗了，所以才演成失荊州，以及吳蜀交戰的局面。這其中的原因，前面已約略談過。主要的關鍵，在孫權既無統一海內的才能，但臥榻之旁他又不能讓強大的西蜀來佔據。在西蜀方面，劉備有光復漢祚的大志，但又昧於聯吳政策的



妙用。推演所及，就使周瑜、呂蒙有進言之機；關羽，張飛逞其剛愎之氣，雖力主協和的魯肅與武侯亦只好束手，王船山在讀通鑑論就說過：「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魯肅字）之謀；蜀則關羽，張飛，破諸葛之策」。於是吳蜀由盟友而變爲仇讎，若使阿瞞猶在，乘吳蜀兵戎不解，兩敗俱傷之時，來一個個別擊破，則吳之爲吳，蜀之爲蜀，豈能再延宗接嗣於數十年之後。反過來說，曹氏之能雄踞中原，吳蜀終未能動其毫末者，亦未始不由於吳蜀的不能同心協力所致，而吳蜀之不能同心協力，終始無渝者，則由於孫劉二主不能盡信魯肅與武侯的獻替所使然，王船山對此亦曾說道：「仲謀（孫權字）之聽子敬，不如其瑜蒙；先主之任孔明，而終不遠關張之客氣。天下之終歸於曹氏也，誰使之然也！」

因爲吳蜀聯盟的破碎，出荆州的計劃頓成泡影；就是出秦川北伐之師，亦因東防未固，以致遲遲其行。直到聯吳政策再得貫徹時，曹氏已有養精蓄銳的餘裕，而吳蜀交兵之後，吳雖幸勝，而兵力已竭；蜀因大敗，損折尤甚，雙方乃有重歸合好的機運。茲將

先生伐吳失敗後吳蜀重結盟好的經過，敘述如左：

當先主敗於猇亭（今湖北宜都縣西），返住白帝城（今四川奉節縣東）時，孫權因聞魏主曹丕將乘虛南征，而國內的叛蠻又禍亂不已，乃派使請和，先主許之，派大中大夫宗璋報命。但此不過信使的往還，並沒有立下同盟的基礎。到了後主即位，武侯輔孤秉政，國家安危繫於一身，爲着貫徹他北伐的大志，非將吳蜀的關係重新拉緊不可。同時，初逢國喪，主幼國弱，更應拉攏東吳，以策安定，故鄧芝方啓齒對武侯說：「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他就立刻答道：「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鄧芝問是誰？他說：「即使君也」。於是鄧芝奉命赴吳脩好。果然此時的孫權對於蜀國的情勢，甚爲狐疑，沒有依時接見，鄧芝乃上表孫權，言明「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這才打動孫權的心，與芝相見，開頭孫權就表明心跡道：

「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

鄧芝答道：

「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孫權聽了後，默思一刻才說道：「君言是也」。遂打斷傾魏的念頭，一心與蜀連合。次年孫權派張溫來蜀報聘，從此信使不絕。相好的程度日趨深厚，甚至東吳的爲政措施，也寫信給武侯徵詢意見。

孫權僭號稱帝，蜀中人士紛請與吳絕盟。但武侯仍堅持其一貫的聯吳政策，並加以剖折道：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所以略其愛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甚多，將相緝穰，未

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成以權利在朝，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

他這篇話就是武侯聯吳的主旨所在，我們看他不僅將利害關係分割得淋漓盡致，就是東吳與蜀連結的機心，他也洞若觀大的指示出來。所謂，「求犄角之勢」，「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孫權只是想在三國盱衡牽制的情況下，求生存，求點小利益的企圖。一般蜀士不加體察，認爲他不能並力，就無連盟必要，這就是不懂得東吳在政略上的均勢主義，故武侯說「似是而非」。由於聯吳一舉，利多害少，故武侯

又派陳震赴吳慶賀，事先並寫信給兄諸葛瑾介紹陳震的爲人道：「孝起（陳震字）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陳震到了東吳，便致書守關官吏，申明敬賀及其結盟好，同心討賊之意。孫權和陳震升壇歃盟，共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盟詞上說道：

「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始若終。」

這就是軍事上的攻守同盟，比較以往的口頭盟約來得更具體，更切實，聯吳政策才算澈底的成功。由於聯吳政策的成功，魏兵才不敢南犯，武侯北伐之師才能大舉。說到此地，或者有人會問：吳、蜀既然有攻守同盟的締結，爲甚麼北伐時不借重東吳的力量，使魏腹背受敵，而可一舉成功呢？關於這一問題可作兩種解釋：第一、武侯的聯吳，主要在建立輔車之勢，並無求其援助之心，換句話說，聯吳只着重消極性的免除東顧之憂，

積極性的互爲聲援，絕不着重於實力的援助。這是一種操之在我的獨立自主精神，而不是依人作嫁的戰爭策略。其次，東吳的機心是當時有識之士所明見的，與其說他的與蜀同盟是在共圖中原，不若說牠的與蜀同盟是在共防中原，所以要得到東吳的實力援助，絕不可能。有這兩種原因，武侯才不肯作東吳并力，共滅曹魏的奢望，何況事實上聯兩國之師，用摧勢蹙鷓張的大敵，往往發生利害爭持，行動不能一致的毛病，六國合縱以擯秦，反爲秦所并，就是前車之鑒。

聯吳政策成功的經過已如上述，現在進而敘述武侯撫輯南疆的經過。

土著部落及游牧民族對於內地的干擾，自周、秦、漢以來是代不絕書，周朝有獯豸，山戎；秦朝有匈奴；漢朝前期有匈奴，後期有西羌。這些部落民族都是長年累月與漢族糾纏不清。到了三國分立時期，這種邊患由於國家的不安定，更加熾盛起來。各佔一方的魏、吳、蜀都不能避免這些民族的攪擾，各自皆有一份負擔。在魏國方面有烏桓，鮮卑，即所謂東胡；在吳國方面有武陵蠻，即山越；在蜀國方面有南方的蠻夷。這些驍

悍難馴的部落民族時在後方動亂，給予魏、吳、蜀三國很多麻煩，隨時有後顧之憂。

魏國的烏桓，鮮卑，在後漢末季，天下沸騰之時，曾在漢南一帶，大肆騷擾，後經曹操的掃蕩，並將烏桓的人數萬遷居內地，北方的邊患才告肅清。

吳國的山越，是心腹之患。在三國志吳書上提及的地方很多，終吳之世，可以說始終沒有救平。東吳之不能涉足中原，也不敢涉足中原，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陸遜就曾對孫權說：「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以想見山越對於東吳兵力的牽制。

蜀國的蠻夷，聚居在南疆，當時的南疆，即現今的四川寧遠以南，以至雲南全省的地方，漢武帝時始開通南疆，設置益州（今雲南昆明，大理等地），永昌（今雲南保山），牂牁（今貴州遵義以南至石阡、思南等地），越雋（今四川西昌縣）四郡，由益州刺史管理，到後漢中葉，南疆時有反側，就未能澈底平定，因為南疆多是蠻烟瘴雨之地，加以偏處一隅，未被重視。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劉備既定全蜀，以益州為根據

地，南疆接壤相依，勢不能不加治理，乃派安遠將軍鄧方督治南疆，方爲人果毅廉正，漢夷人等都敬服其威信。方死，劉備問治中從事李恢，誰可繼任？恢答：「昔先零之役，趙充國有言，莫若老臣」，遂以李恢爲都督，建興元年，越雋叟（蠻族）帥高定殺郡將焦璞，稱王叛亂；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而歸依吳國，吳派闓爲永昌太守，欲以動搖蜀中。同時牂牁郡丞朱褒因權理太守事，亦恃遠恣睢，南中遂成混亂局面。武侯以此時先主新去世，國事未定，不便出征，乃派越雋太守龔祿屯安上，遙領郡事。另令從事常順携都護李嚴的信去勸諭雍闓，但雍闓却答道：

「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分崩，正朔有三，遠人皇惑，不知所歸。」由這封回信，可以看出他傲慢的程度。後來常順再到牂牁，就被朱褒所殺，稱兵作亂，雍闓也鼓動夷酋孟獲共同蠢動，率衆圍攻永昌。幸得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堅守不屈，輿城始終未被攻破。

自來對於土著民族的綏靖，不外勸、撫、兩種方法，勸是臨之以威，撫是臨之以德



。但是，士著民族多半智識開昧，要畏威才能懷德。尤其是後漢末葉以來，王綱不振，政府威信損失殆盡，加上動盪的社會，龐雜的政治力與經濟力的結合，造成人心思亂，各求出路的趨向，這些無知的蠻夷更容易爲野心者所鼓動，所蠱惑。因此，尤不能不炫之以威，使其懼復。然後才能談得到以德撫綏。在建興三年春，吳盟締結之後，武侯遂不得不冒溽暑出征了。臨行之前，曾問計於馬謖道：「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

「馬謖答道：

「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他這番話正與武侯隆中對策所說的「南撫蠻夷」的定策相吻合，自然爲武侯所贊同，但是要達到「服其心」，仍必須炫以力。故武侯乃領大軍由安上循水道入越雋，另遣馬忠向

群荆進發，李恢向益州進發。高定聞大軍至，堅壘固守，武侯進兵攻擊，大敗其衆，斬殺高定。雍闓將士聞高定被誅，也將雍闓殺掉舉衆請降，永昌始復定，此時惟有孟獲倔強不服，雖其人乘送爲李恢追殺大敗，仍鳩合餘衆抗拒蜀兵。武侯遂帶領大兵，渡過瀘江，進攻益州，與孟獲交戰，大破蠻軍，生擒孟獲，盛設兵仗，令其觀看。三國志蜀書引漢晉春秋所載：

「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武侯這種做法，完全是恩德並用，使蠻夷心悅誠服，不敢復生亂萌，故終蜀之世，蠻夷不惟沒有作亂，反而很多幫助的地方，在兵源方面得到很大的補充，華陽國志有：

「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軍，分其羸弱，配

大姓焦雍、婁孟、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

在經濟方面也得到豐盛的收穫。蜀書載：

「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又張械著的武侯傳內說：

「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  
可見在軍事上與財政上，南疆的綏定均有莫大的補助。

孟獲請降之後，武侯便到了滇池（現今之昆明）。南疆悉告平定，乃將其地分爲建寧、雲南、興古、牂牁四郡，又恐蠻性剛狠不馴，便用官爵來羈縻，凡大姓得出其金穀，募壯丁以爲部曲，並給予世襲官職。於是貧的蠻人因貪得財帛，不願爲亂；富的蠻人得了一官半職亦不願爲非。這真是針對當時危亂社會的一付安定藥方。就政治方面說，大姓豪強有官職的虛榮，炫耀鄉里，遂認識國家的尊嚴性，一心歸向漢室；就經濟方面說，貧無立錫之人因生活有保障，又何苦挺而走險，尤其是蠻夷的腦筋比較單純，有

了信心，就會終生不渝。武侯有鑒於此，故主張仍以夷治夷，不另派官吏，不另外駐兵監守。當時有人不明武侯用意及其眼光遠大處，主張改土歸流，去酋長，設官吏，武侯遂列舉理由，分析利害道：

「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屢有廢殺之罪，自嫌葷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淡粗安故耳」。果然，他這個辦法實行之後，南中大為安堵。

就前面所述的歸納來說，聯吳政策是獲得大部份的成功，因為消極方面的目的——**✓** 混除東顧之憂，是完全達到。只有積極方面的目的，僅得到聲援，而沒有得到實力的支持。這是由於東吳本身的機心，加以自身能力也有所未逮。在武侯方面也沒有存此想頭，前面已經說過。但若東吳能夠同時出兵，不必要牠作主力，至少也可給魏軍很大的牽制，故武侯最後一次北伐時，曾寫信給孫權道：

「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剿滅，未遂同盟。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心。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執事以同盟之義，命將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書不盡言，萬希昭察。」

結果孫權自率水軍東征，嗣聞圍合肥新城的兵敗，未到壽春即行退還。但對於魏軍也曾達生了牽制作用。

至於平蠻一役，可以說做到澈底的成功。消極方面的內顧之憂固已不必置議；而積極方面的兵源及軍需確可源源補充。

因為聯吳及平蠻都能夠恰如理想的實現，武侯才能毫不顧忌，殫心竭力於北伐，以至前後出兵達六次之多，而國內及東防不惟全無烽警之憂。國力及兵力反有駸駸日上之勢，這就是他苦心經營的表現和代價。

## 八、新政治，新作風

處在人心動盪的社會，政治狀況是官常敗壞，內政不修，經濟形態是地主商人豪族的恣橫，以至驕奢淫佚，爲所欲爲，而農民則胼手胝足，難圖溫飽。再加上橫征暴斂，不知存恤的剝削，遂逐漸釀成好事生非的心理，東漢末季的社會，其所以弄得四分五裂，國事蠅蟻，不可收拾，原因在此。後來因三國的形成，政局粗定。但這是軍事上的力量所促成，還得要有良好的政治措施以繼其後，才能穩定人心，鞏固根本，尤其是鼎足的三國各傳說，遇有可乘之機，卽有乘隙抵瑕的舉措，更不能不在政治上有優異的表現。先就曹魏方面來說：曹操有用人之明，故他人才最多；因而在政治的措施上既有獻替可否的謀士，也有埋頭苦幹的吏才，遂蔚成比較清明的政治，他能夠雄據中原，代漢而興，絕非純恃軍事的力量，主要還是在政治上有相當的辦法。次就孫吳方面來說：孫

繼承父兄的餘業，有許多名士爲股肱，當中原雲擾的時候，他就專以修明政治，收拾人心爲務，故政治上也是有相當的成就。最後說到西蜀，這是一個難治易亂的地方，所謂「天下未亂蜀先亂」，加上多年來劉焉劉璋一味姑息寬縱，養成一種正義不明，紀綱不振的風氣。同時，劉備得到的時間較晚，彼時曹魏在中原，東吳在江左已經各有根深蒂固的基礎。故治理西蜀不僅要從難中求好，更要從好中求快。這可謂非常艱鉅的任務，以下將敘述他是用甚麼方法來達成這不易完成的使命。

首先他揭發復興漢室的政治主張，以正視聽，進而約束不安定的人心，造成向心的精神力量。這種偉大的政治主張，在動盪的社會中不啻是一付安定劑。因爲在地方割據的政治局面之下，日積月染，多數人的知識在不知不覺間已屬麻木不靈，無所謂是非義利，亟需一種發聵振聵的嚴正口號，來提撕，來啓發，才能喚回失去的人心。尤其是益州究竟偏在西南，漢室的德沛難於普施，加以劉焉佔據之下，對於當時的漢朝毫不恭順，老早就製作乘輿，以帝王自居，流風所被，一般人的正統意識更爲模糊。就是一般智

護份子意志都是非常動搖的，如張裕就會經私自語人道：「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甚至於有好多先就替曹魏作義務宣傳的，如杜瓊就說：「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士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又如譙周更說：「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由這些例子，就可窺測出當時一般士大夫的反側心理，至於一般無知的民衆不消說最容易受煽動的盲然聽從。爲着攻破這種混淆人心的異端邪說，爲着鞏固全國一致的精神陣線，實在有大聲疾呼，提出大義所在的政治主張之必要。

其次他厲行法治，以推行政令，貫徹主張。這在政治經濟形態都極端紊亂的時代，最是應時的良劑，就政治方面說一般豪族大姓往往因緣時會，把持政治，東漢末季的割據，就是由於他們爲虎作倀所致，結果弄到州牧郡守對於他們，唯有俯首帖耳，唯命是從。如趙韜，龐羲，李異雖是劉璋的僚屬，但趙則公然稱兵反叛，龐、李則恃功驕豪，



尾大不掉，就是一例。就經濟方面說，自從封建制度沒落以後，繼之而起的地主往往是與士族結合的，因此在經濟剝削方面程度是加深了，而農民也莫可如何，這由於這批地主不僅有經濟的支配權，同時還有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的潛勢力作支柱。如在中原，曹操的部將競招由荊州回來的流民耕田，東吳的諸將也「各廣其田」。至於其他士大夫而身兼地主的更不可勝數。爲着要安定社會，保障農民的生活，勢非對他們有相當的裁抑，才能保持社會的均衡，不至於造成偏在的榮枯。在三國志蜀書中就載有：

「益州承劉璋開弱之後，士大夫多挾其尉，勢，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巨室不便所爲，多怨讟者。」

這種裁抑豪強，使小民來蘇的手段，爲後漢政治中所少見的作風。非眼光遠大，魄力雄厚的人不敢輕於嘗試，因爲「爲政不得罪於巨室」，早成爲金科玉律的做官哲學，誰不想保持祿位，安然無事，誰願意掀動潛勢力龐大的豪強，來自尋麻煩。從而做官者以沓泄粉飾爲能，全無利國福民的打算，東漢末葉的社會擾攘，以至國家土崩瓦解的現象，不

能不說官吏的無能，有以演成。可是當時的人有多數就不明瞭他這種做法是滅除亂助的根本措施；還墨守不合時宜的寬縱政策來相諫阻，如法正可算是西蜀人才中佼佼者，也以爲他的作法太嚴峻，曾對武侯說：

「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懷其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治新國，未垂惠撫，且主客未習，宜稍稍寬假，以安反側之心。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

他這種說法大概很能代表一般儒生士人的意見，故武侯加以詳細的說明道：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所以弘濟。今劉璋關弱，自其父焉以來，文法蠲廢，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令不行。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濫；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緣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嚴恩並濟，上下有法，爲政之要，於斯著矣。」

在他這種嚴峻的法令鞭策之下，凡是目無法紀的士大夫自能不能安於位；怯懦的豪強大

姓自然也惴惴在心，圖謀反抗。如漢嘉太守黃元舉兵攻臨邛，牂牁太守朱褒擁都反叛，益州大姓雍闓稱兵作亂，並煽動蠻夷響應。這些都是法令厲行之後意想中的反響，只要將這輩政治途上的障礙，舊社會中的渣滓，掃蕩肅清以後，國家社會就可日趨又安，政治就可望日趨清明。

不過，要實行法治能澈底，必須要如他所說的：「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這就是說要公正嚴明，公爾忘私。斬馬謖，黜李嚴，廖立都可說是這種精神的表現。故當時的張裔曾讚頌道：

「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亡其身者也。」

既厲行公正的法治，則無論賢愚都可繩墨於規矩之中，這樣就可養成守法的習慣，即是管子所說的：「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犯俗離教者，衆共竅之。」結果，在不知不覺之間，將法與俗陶鑄而成「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管子），國家當然可望

大治。

其三，他用開誠布公與集思廣益的方法濟法治主義之窮。因為法治固然可以劃一人心，整齊行動，但同時也可鋼鐵人的思想，言論，就是利國利民的主張也不敢貿然發表，推延所及，遂容易造成爲政者偏狹，固持的作風，國家的政治也不會有開明的希望。於是上下壅塞，政治的措施就難於進步。如李斯的焚書坑儒，鉗制言論，思想的法家作風，就導引秦朝走向土崩瓦解的前途，故武侯一方面雖厲行法治，一方面却非常開明的接受衆人的意見。他在「羣下教」中曾有懇切的指示：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董和字）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他這篇訓詞，已經可謂說到娓娓動聽，鼓勵大家進言的誠心活躍於楮墨之間；但他還嫌

不夠深刻，恐怕大家還是不願發言，因此又重申前旨，更加切實的說道：

「昔初交州平（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勸見啓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胡濟字）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字，終始好合。」

這一篇文章比前一篇來得更誠懇，更坦白，實在有虛懷若谷，從諫如流的胸襟和誠意。身負鈞衡重任的執政者有這樣的氣度，自然可以造成開明的政治，使上下的意見與隱情能夠互相溝通，不會如專從法治者的專恣自大，故步自封。

其四，他注重人治以輔導法治。在我們的國家一向着重於「為政在人」的做法，因此無形中養成行法須得人的習慣，往往一種政令，由某人來執行就可風行草偃，由某人來執行就會扞格不入，其實就政令本身說，却是法良意美，為甚麼有這樣軒輊呢？我們的解釋是：一般的人民歷來就注重人的因素，這就是說，他們對於執行政令的人不僅要要求他奉公守法，其他如學養、才能、志向、節操、以至於私人的生活情形都有嚴格的標

準。只要是合乎標準的人法令都是容易推行，就是有一二不當的措施，大家也可曲加諒解。所以歷史上成名的官吏大都表現「以身作則」的示範作風。武侯處在這種積重難返的習俗之下，自然一時不容易挽回。同時他也無心來挽回，因為法治與人治究竟並非衝突的，只要能夠使用得法，還可以相得益彰。所以武侯對於當時的官吏的遴選頗為嚴格，他就曾說過：「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治」。可見他是非常着重於任官的人選。從而他所用的都差不多是才德俱全的人。如蔣琬是「託志忠雅」；如費諱是「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蔬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如董和是「躬率以儉，惡衣蔬食」；「官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僦石之儲」；如劉巴是「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又能「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如楊洪是「忠清款亮，憂國如家」。至於有才無德的人武侯都不事姑息的淘汰，以免影響於整個的政治風氣。如彭美是一個輕狂浮囂的人，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故武侯密告劉備道：「美心大志廣，未可優安」，果然後來就勸誘馬超共同造反，幸而馬超意志堅強，未爲所動，要不然蕭牆之

禍，必接踵而生。故素之死可謂死有餘辜。如廖立與彭羨也差不多，輕狂的程度也不相上下，平時間的口頭語一定就非常荒唐，所以才能罵得出：「萬人率者，皆小子也」的話。他的破廢也是罪有應得。最後再說到與武侯私交很好，又同是受遺詔輔政的李嚴（後改名平），當武侯北伐的時候，他專司糧運，嗣因天雨恐糧不能如期到達，他就譸張爲幻的大弄玄虛，三國志蜀書本傳載：

「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

他這種含沙射影的誣陷與文過飾非的自私，由這一段記載中可以看出來，這種人還能再加信任來担负軍國大事？因此，武侯只好拿出他前後手書的經過相詰責，「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結果被廢爲民。

武侯的取才既有一定的標準，凡是適合標準的人，他無不量材器使，各盡其能。譬如原在西蜀跟隨劉璋的幕僚姻親，以至於爲劉璋所排擠忌刻的人，他都無不盡其才能，分別任用，蜀書劉備傳上就說：

「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又璋之所排擠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說勸。」

這是他對西蜀原有人士的甄拔使用。至於其他如蔣琬，費禕，姜維等也是一有認識，就寵用不衰。

取才，任才都分別做到理想的標準，最後膾下來的只有養才這一項工作了。一般人對於武侯的養才，多認爲不夠積極，以致身死之後，沒有人能繼承他的責任，不能發揮新陳代謝的作用。關於此點，有兩項解釋：（一）養才可分作兩種看法，一是培育將來的人才；一是陶冶現在的人才。就前者來說，西蜀的教育制度並不是不完備的，三國志上



續載有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伊籍等「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來敏傳上有：「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尹默傳上有：「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譙周傳上有：「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可見武侯對於陶育未來人才的措施，也是注意到而加以制度化的。就後者來說，他對於現有的人才也是盡到髮掖提攜的能事，如對先投曹操，半途來歸的劉巴，他就在先主面前稱讚道：「運籌帷幄之中，實不如子初遠矣」。如對於姜維，武侯就頗有提拔他作繼承人的意思，故對他一再的好評。在武侯給張裔，將琬書內就說：「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永南（李邵字），季常（馬良字）諸人不如也，其人京州上士也」；又說：「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可見武侯對於他的賞識，假若武侯遲死數年，經他不斷的培養薰陶，姜維大有承繼的希望。又如蔣婉是承繼武侯擔當國事的人，可是蔣婉在做廣都長的時候，因劉備猝然蒞臨，見其不理衆事，時又沈醉，就想殺他。還是武侯勸道：「蔣婉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請重加明察，劉備才

沒有殺他，再如費禕也是第二個繼承人，在他官階很小的時候，武侯就深悉他的才能，爲要培植他的聲名起見。當武侯南征歸成都的時候，在文武百官夾道歡迎的場合中，獨與禕共載而還。像這些例子皆是武侯栽植現有人才的苦心孤詣所在。所以把前後兩點歸總來看，武侯的養才設施也是無可訾議的。

二、蜀國的人才本來很少。習鑿齒就已說過，「才少上國」的話，在三國志蜀書許慈傳內裴松之注引孫盛的話道：「蜀少人士，故慈濟（胡潛）等並見載述」。其所以人才較少，是有兩種原因。一是當時的文化是以洛陽爲重心，所謂人才薈萃之地。這一帶的地方久爲曹操所佔據，故他得人最衆。西蜀地方較爲偏遠，在當時除了外來避難的人士外，本地的人才就不多。同時劉備得根據地時較遲。多數的人才差不多都各有其主。因此更影響到人才的羅致。我們看蜀書上列傳的人物，自諸葛亮起至楊戲止，有專傳的共計五十六人。其中隸籍荊州者二十二，益州十八人，司隸五人，徐、幽、涼、豫各二人，冀青兗各一人。這就可明瞭所得中原人士的稀少，就是建國的益州，也並沒有選拔出多

少人。在此種時空情況限制之下，任何人都只好束手。我國古語說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就是表明培育人才是需要長久的歲月，決不是短時間之內可望有良好的收穫的。我們計算，從劉備佔領益州起至武侯死時為止，其間不過二十一年，要想在這千戈不停的二十一年中來培育人才，陶冶後進，能與中原相頡頏，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對於武侯的養才認為無成效，並非持平之論。

武侯對於人治的應用裕如，故能彌補法治的不足，前已具論。但他所以能應用裕如，除了知人，任人的才能外，還要他本身的人格，操守，能夠發揮示範的作用，方足以折服人心，感化羣倫。現在我們就來檢討一下：

我國一向對於做官者的要求，不外忠、慎、勤、廉四項條件，先就忠來說，武侯自輔佐蜀漢，建國建軍大任，萃集一身，而他所有作為，無不以國家為重，故能將西蜀之地造成政治清明之域、吳、魏皆非其匹，這都是武侯的忠謀靖獻有以促成。當先主兵敗歸來，舉國皇皇，繼而駕崩，後主關弱，如何安定人心，發揚勇氣，武侯責無旁貸。故

他聽到先主臨死時對他說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時，就涕淚橫流的答道：「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這種孤忠耿耿，可昭日月的自白，真可謂流芳於千載。他以後的一切措施以及於他的生命，也真是在忠勞國事中死去，由這一個例子，就足以窺見他的忠心謀國的精神，其次說到慎。他的謹慎程度早已有口皆碑的事實。所謂「諸葛亮一生唯謹慎」的詩句更屬流傳民間。因此才有空城計一段事實的捏造，故此地不必再加申論。其三說到勤。他當國二十餘年，文治武功全由他一手造成。在軍中是「罰二十，皆親覽焉」，在府中是親校簿書，昕夕從事，當時的主簿揚顯看見他太過勞苦，就曾勸他道：「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爲治，乃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武侯對於他的話很表贊同，且爲着整個的國事得以瞭如指掌起見，還是不懼勞苦的躬親校理，由此可見他勤的程度。最後說到廉，大家都知道他是澹泊明志的實行者，在他臨死前上給後主的表中就說：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到他死後，他的家中情況果如他所言。由這一段事實也就可以見及他廉以持身的操守。由於武侯本身人格，操守是這樣的完整，所以他才能以求諸己者求之於人，而大家也才能翕然景從，蔚成風氣。蜀國雖人才稀少，但能造成光明燦爛的政治局面，一時的士大夫皆妙才上選，原因即在於此。

最後，再來談一談武侯富國理財之道。我們都知道，政治的安定要以經濟的安定為依歸，軍事力量的發揚要以經濟情況的穩固為條件。因此有關經濟的措施實在是政治，軍事的基本，應該值得我們的檢討。但可惜是時的治史者無良史家的識見，對於他富國的方略竟未能述其梗概。使我們難於深悉。試想當時的蜀國不過一州之地，但能抗天下之全力而綽綽有餘；頻歲出師而財政不聞稍有困絀，民生亦能安堵如恆者，固必有獨特

的手段與方法，足以濟其志，行其意。現在惟有就考據及推想所及，略敘如左：

農事爲當時促進生產的唯一要政，軍精民食皆仰給於此。但是要能使農事發揮生產的最大能力，必須一方面獎勵生產，一方面調整分配，關於前者，在武侯的本傳中並沒有提及，可是在後主本傳中就有：「三年建興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的記載。因當時的執政者是武侯，自然也可視爲武侯的政績；關於後者，雖也無明文의記述，但是就他裁抑巨室，哀恤小民的遺事中足以反證他是相當做到的。因爲自從東漢末季以來士族與地主二者就合而爲一，要不是有法令相繩，農民的痛苦惟有日加沉重。生活不安定，農事就要受影響，還能在供給民食之外，再有賸餘以爲軍精之用。

其次再說蜀國的物產種類雖多，但也不能應有盡有。因此就不能不向外交易。故有人說武侯的聯吳必有通商惠工的作用，確有相當的理由。因爲當時的江東諸郡，文化的進步較遲。工藝的技巧，必不如西蜀，以蜀的貨物沿江而下與之交換財物，誠屬應有的措施。至於南平蠻夷取其土產，以供軍國之用，已見前文，不再重敘。

最後，關於工藝方面，武侯也是非常注意的。因為他本人就長於巧思，如木牛，流馬，流弩等的發明，以及他在「作斧教」中對於刀斧的注意均可概有。故陳壽在對武侯的評語中說：「工械技巧，物究其極」。

農、工、商三者是生產中的要素，他都能兼籌並顧。齊頭發展，自然民富，民富自然也是國富。

歸納上面的所有措施來說，他的這種新的政治與新的作風，不僅為秦漢以來所僅見，就是千餘年後的今天，還是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借鏡與取法。同時由他這種政治的作為中，使我們窺見他的思想淵源，並非是偏執那一家，固守那一派，可以說王道雜霸，再探合各家之所長。因此才能做到如陳壽所評述的：「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威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的偉大政治局面。

本書就此結束，為求概括的表彰武侯的功業起見，願意引用裴度所做的蜀丞相諸葛

武侯祠堂碑銘中的銘，當爲尾聲：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成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夷，鋪敦涓涓，躡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尙文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固結。古柏棲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峯，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諸葛亮

110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二—三〇〇〇)

諸葛亮

定價國幣五〇〇元

編著者 周佐治

發行者 青年出版社

印刷者 美吉印刷社

地址：南京四牌樓  
電話：三四〇一二轉

版權所有

.825  
-821